

37094

27

中國教育學會年報

民國廿六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647532

07

中國教育學會編

中國教育學會年報

中華書局印行

年六十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中國教育學會年報

目次

前 論 著 問 題 研 究 調 查 報 告 附 錄

言

論今後教育之趨勢

現代教育思想之演進

憲章教育章修正意見

西北教育建設芻議

一、戰後世界和平與教育改造問題

(一) 戰後世界和平與教育改造之意見

(二) 戰後世界和平與教育改造意見

(三) 戰後世界和平與教育改造問題

(四) 對於戰後世界教育問題之管見

(五) 關於戰後和平與教育改造問題的意見

二、改革學制問題

(一) 對於縮短現行學制總年數問題之意見

(二) 現行學制總年數縮短問題

(三) 評縮短現行學制總年數案

(四) 調整現行學制芻議

(五) 論各級學校年限之縮短

重慶遷建區小學學生智力及體力調查報告

甘肅省臨洮縣教育調查報告

日本侵略教育與奴化教育之概述

本會總章

本會會務進展概況

本會歷屆理事名錄

張伯苓

常道直

林 本

程時燧

鄭西谷

沙磁分會

青木關分會

廣東分會

艾 偉

黃覺民

潘 救等

艾 偉

歐元懷

方 惇

余書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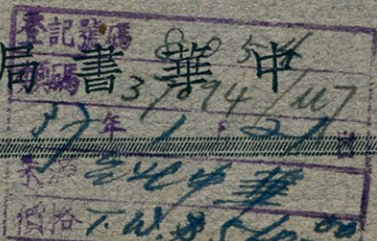
艾 偉

沈亦珍

余書麟

余書麟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
三十六年

中國教育學會年報目次

中國教育學會的時代使命(代序).....	朱經農(一)
論今後我國教育學術界努力之方向.....	常道直(四)
戰後教育問題提要.....	汪懋祖(七)
中國教育的革故鼎新.....	周 尙(一二)
今後之大學改制.....	余家菊(二〇)
今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新動向.....	黃 溥(二二)
高等師範教育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之途徑.....	艾 偉(二九)
關於吾國高級師資訓練幾個重要問題.....	中國教育學會 西北分會(三二)
今後中學教育改革管見.....	林 本(三九)
論今後我國中等教育的改造.....	金澍榮(四九)
普及民衆基本教育問題.....	李季開(五三)
我國職業教育建設之途徑.....	石顯儒(六二)
今後職業師資訓練之商榷.....	鍾道贊(六七)

自由人的教育	陳劍恆（七一）
欣賞教育	吳蘊瑞（七六）
世界教育專業組織之誕生及其使命（出席世界教育專業會議之報告）	常道直（八〇）
附錄 本會理監事會重要決議摘要	（八六）
專載 世界教育專業會議關於國際了解之建議（英文本）	（一-一三）

31074
07

中國教育學會的時代使命

代序

8054

人類的教育活動，雖遠在原始時代即已存在，但是教師的地位卻是在文藝復興以後才得到新的估定，而自由結合的教育專業組織，更是教師正式成爲社會上一種職業以後才奠定其基礎。到現在，各國教師所組織的專業團體，正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即以美國而論據說各州各地的教育團體，在美國中央教育處(The Office of Education)所發行的教育指南(Educational Directory)所載的，即有五百餘單位，可見其盛況一斑。各國教育團體的組合，用意雖屬不一，大部分則無非是爲謀維護本身的專業利益，並爲道義的合作和互助；但其影響所至，卻普遍提高了教育專業的地位，增進社會和國家的利益，而發揮了更高的價值。

我國近一二十年以來，教育界人士自由結合的專業組織，亦復不少。其中固不乏組織龐大，歷史悠久的團體。如中華兒童教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平民教育促進會等，即已擁有不少的會員。但是，論及一般性的全國性的教育專業組織，實不能不首推中國教育學會。該會自民國二十二年成立迄今，恰有十五年的歷史。雖然其中有一半的時間，是在戰爭的苦難中掙扎奮鬥；但是它的組織吸收了全國最優秀的教育界人士，它的活動包括各種專題研究，舉行年會，發刊年報，從事實際的教育調查，參加國際教育專業會議等。綜其影響所至，不僅增厚了教育界的團結力量，提高了教師的專業地位，發皇了教育學術的研究，促進了國家教育的改革，同時，還奠定了國際合作的初步基礎。十五年來，實獲得了不少的成果。

國家勝利，經已兩年。今後正是埋頭建設的時期。教育在這一空前的轉變的時代，必能發生偉大的影響。中國教育學會既是國內唯一的一般性的全國性的教育專業組織，自有其應負的時代使命。茲請舉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倡導教育學術研究 我國目前在教育領域內未被解答或覺察的問題甚多。有些問題，看來似屬一種局部的性質，實則浪費公共資財，虛擲兒童青年光陰，莫此為甚。過去企求解決此種問題，多喜信仰權威，或偏重臆測。因此問題的本身，始終不易獲得適當的解決。最近雖亦間有運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的，然多屬個人零星的努力，人才、經費頗有限制。因此今後教育學術的研究，倘能由教育專業團體來鼓舞、來推動各個分子共同努力，成效必能立觀。中國教育學會過去組織有教育調查所，曾發動會員力量，從事兩次大規模的調查工作。平時又常舉行座談會，從事各項專題的研究。而舉行年會，發刊年報，又能使各會員獲得交換研究意見，發表研究結果的機會今後倘能有計劃的倡導研究工作，必能完滿的實現此一功能。

二、發揚教育民主精神 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今後我國的教育是在向着民主的大道前進，這已為一般所公認。教育如何而後民主？教育機會的力求普遍均等，並以大部分的經費應用於大多數人身上，自然是切要的事。

但是，教育界自身之能貫徹一種民主的精神，實是急迫之圖。本來真能代表教師的自由結合的專業團體，其組織力量的發揮，充分享有教育行政設施建議權，乃是一種真正的教育民主精神的表現。中國教育學會歷屆年會的決議案貢獻行政當局以教育改進的意見，固曾發生不少的影響。今後應更積極的善用其職能，代表一般教師充分貢獻教育改進的意見，舉凡對於國家及地方教育政策設施，以及教育立法監察的進行，均能盡其力之所能，儘量爭取參與的機會。

三、提高教師專業地位 教育專業組織固在教師正式成為社會上一種職業以後，始得奠定其基礎。但教師專業地位的提高，又有賴於教育團體的努力。中國教育學會既具有全國性的教育學術團體，則必須積極負起責任，設法增進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其他素質，提高專業水準，以使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員均有深厚廣博的訓練基礎；而不使未受專業訓練，不及標準的，或已轉業的分子，濫竽或重入於教育專業的領域。同時又須努力提倡專業服務精神與道德，務使國內每一教育工作者人員能够敬業、勤業、樂業，對於教育事業具有真正信仰和抱負，能以畢生精力貢獻於教育事業。

四、促進國際教育合作 教育乃是謀求全人類福祉的事業，原不應以國界而有所軒輊。二次大戰的結果，使各國澈底覺悟由於增進國際了解的重要，更使國際教育合作有所必要。此種國際教育合作工作，倘能由各國教師自由結合的專業團體來協作推動，必能更見成效。中國教育學會既是我國足以代表一般性的全國性的教育專業團體，實應積極推進此種國際教育的合作工作。去年八月間之參加世界教育專業會議，以及一部分會員之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的工作，固已足奠定初步的合作基礎。今後倘能就此基礎再進而積極參加各項活動，並相機宣揚我國往聖先賢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理想，則不僅可使國際教育文化得以交流，抑且於增進世界和平得有莫大助益。

吾人深信：組織就是力量。人類的活動，惟有透過組織，才會孕育和發揮偉大的價值。中國教育學會乃是國內教育界公認重要的專業組織，它已具有輝煌的十五年的歷史。我們希望它能就此業已奠定的基礎，更進而發揚光大，肩負起時代的使命，表現無限的偉大的力量。茲值三十六年年報發刊，謹貢獻數言，以與我全體會員共勉之。

論今後我國教育學術界努力之方向

常道直

在獨裁政制下，一切創制、改制，皆發自最高中樞，下級機關但有絕對遵行之義務，人民則根本無參與末議之可能。在民主國家，則教育上所有重要興革，多由教育學術專業團體倡導於前，復得熱心社會專業人士之贊助，最後乃由負國家行政之責者付諸實施；其程序適與前者相反。前者之組織表面上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宜若行政效率甚高；實則苟中樞稍欠健全，立即影響及於全身，而陷於麻痺不仁之狀態，計劃形同虛構，法令流為具文，凡略諳行政實況者類能言之。後者彷彿積石為山，引水成渠，用一分力量即可收穫一分效果，敷衍搪塞之腐化官僚作風，絕無立足餘地。且教育興革，既係本諸足以代表全體教育學術專業界之公意，自可期其全力以赴，初無待於行政力量之驅使，我們可以名之為教育專業之自主，這是現代民主精神與我國儒家之德治主義，可以互通之點。

我國現正走向民主大道，從而我們教育學術專業界同仁對於今後中國教育之發展，必須負起更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毫不遲疑地認定我們的工作目標所在，並竭盡我們的全心全力以達成之。茲就個人思慮所及，將我們應有之認識與今後努力之方向分述於後，以就正於我教育界之同仁：

（一）教育學術及專業團體是教育界同仁為砥礪學行，鼓舞專業精神所為之道義的結合。教育專業之未被重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若干所謂業餘的教育家故作詆毀之辭，以掩飾自己之缺點。流俗不察，雖間有隨聲附和者，實則不值一笑。他方面，我教育界同仁對於學行砥礪功夫，力有所未至，亦不能辭其咎。已往八年，我教育界同仁在物質生活方面既已歷盡艱辛，同時我所固有之尊師傳統，亦幾瀕於澌滅，更無從獲致精神方面之補償。在如此情況下，一部分為人師者之未能自重，並不為世所重，實不足怪。此後願各盡力分內工作，務期一言一動，足以為世師法；同時對於假教育之名，遂其自私自利之實者，尤須用集體力量，予以制裁。果能做到此一地步，行見一般社會

之觀瞻爲之一新，而教育專業精神自將日益煥發。

(二)教育學術及專業團體是教育機會均等原則之守衛者。全民教育機會平等是保障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民主之先決條件之一，違反了這一原則必然引致社會階級裂痕的深刻化，終致削弱民族團結的力量。我們純然站在教育的立場，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對於一切兒童及青年，不問其來自何種社會階級，亦不問其種族宗教上之差別，均當使其德、智、體各方面發展到最高可能的限度。在消極方面我們要時時提防，不使一部分人因爲在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所處地位之優越，而壟斷了較高等級教育之機關。惟有教育者纔能有如此恢弘的胸襟，亦惟有教育者的集體組織，纔能確實負起這種神聖的使命。

(三)國家教育政策之裁決，重要教育方案之產生，以及一切與教師有切身關係的各種規章之制定，均應由真能代表教育專家及教師意見之教育學術專業團體積極參加，這是教育專業化之最低限度條件。美國之教育方針常隨全國教育聯合會之集體主張而轉移，早爲世人所共知；即在素以官僚政治著稱之法國，其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亦均有教育審議會之設，構成人員兼有官方代表與教育界自行選舉之代表。爲提高專業的自覺與自尊起見，我們必須直接參與學校課程標準與教材綱要之編訂，教育人員資格之甄審，待遇章則與薪津等級之規劃，以及其他具有重要性的事項之決定。教育者對於自身種種，倘事事處於被動地位，安能負起領導社會之責任？前舉各類事項，因事實上之限制，或不易使每一教育者均有親身參與之機會，但最低限度，必由名副其實之代表機關——教育學術專業團體——履行其職能。同時必須防止非屬教育學術專業界之份子，強顏作爲我們的代表，藉以達成其他目的。

(四)教育專門知識與技術，以全國性之教育學術團體爲其總匯。舉凡教育領域以內專門問題之解決與技術工作之執行，所需專門知識與技術，均須仰給於此。不幸在醫學昌明時代仍不乏乞靈於巫師之病人。近世教育科學及技術上之成就，每被忽視。倘遇需要專門知識或技術問題時，往往並不謀諸專家，而一任所謂業餘的教育家逞其主觀成見，結果鑄成大錯，則又轉而歸結於教育科學之無用，與教育專家之無能。教育科學技術之價值，可由教育調查一事見其一斑。美國近世教育之突飛猛進，即係得力於科學的教育調查，清算已往之成果，預測今後之需要，據以

釐定若干年來所當遵循之步驟，與按期所應完成之工作，其功能頗類似建築師之有藍圖。執行調查工作者須有各種專家，運用最新教育技術，通力合作，乃能有濟。返觀我國一般所了解之教育調查，乃憑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之少數督學，走馬巡視，至多再加以粗略的調查表格若干份，責有關機關人員，按式填報，遂以爲已盡教育調查之能事，實則全失科學的教育調查之真義。

以上所舉四點：砥礪教育專業精神，保障教育機會平等，參與實際教育行政，發揚教育科學技術，彼此間實存在着不可分離之關係，非充斥着純正偉大之專業精神，必不足以負起保衛教育機會平等之鉅任；非親身參與重要國策之決定，更無從實踐前項神聖之使命；而專業精神之培植，又非有精深博大之教育科學知識與技術爲之基礎不爲功。綜此四者，最後乃能達成教育專業地位之提高，隨着教育專業地位之提高，我教育學術專業同仁所負責任亦將因而加重。「建國時期，教育第一。」願共勉之。

戰後教育問題提要

汪懋祖

教育爲各項建設之本，總裁在「中國之命運」一書內指示：「建國之基本，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之完成，又必須就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五項要目，製定周詳的方案，而使之實踐力行。」竊不敏，願從事研究吾國戰後教育上主要問題，試提示要項如左：

第一：「中國之命運」中指示經濟建設，依照國父實業計劃，計算最初十年內，需用各級幹部人才之數目，約共二七〇萬五千餘人。其中大學及專科畢業生共占五十一萬餘人。而實科學生占四十八萬餘人，即平均每年需產四萬八千人。現在大專在校學生僅有六萬四千餘人，內實科學生約三萬。以大專修業平均年限計之，每年只能產出實科人才一萬人。再假定現有適用之實科人才爲十萬人而尚能服務十年者，則今後十年內尚須產出三十八萬人。又現在在校之大專學生，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則每七千餘人中只有一人，較歐美各國瞠乎其後。所以大專學校之亟須推廣，無待贅言。但因師資設備及種種條件尙難急速增加。在最初三四年內，除一面充分使用原有之人才並選拔優良出國進修外，一面充實原有學校，使每年平均能增加實科生一萬人，文科學生亦應視需要增加。如是則已比現在所有數量擴充一倍有餘，但以視建設上之需要仍患不敷分配。

第二：學校數量之須求增加，已不待言；而人才之需用，又如是其急切，勢須縮短大學修業年限。近頗有人主張縮短一年者，鄙見初不贊同此議。但看戰時大學四年生紛紛徵調充譯員，因應建設事業之急迫需要，似亦可仿此成例。可將大學課程酌量緊縮，將四年級學生分配於各建設部門，以作練習生，仍於大學及建設機關內，開設應行補修之學程，定爲早晚課，修完規定學分考試及格，方給予學位。（以上所提自以參加經濟建設及生產部門爲限。）按桑戴克說明成人學習課程拉長，與工作配合之有益，則不但與學習原理無背，抑且有知行並進之妙。

第三：有人以抗戰以來之教育，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徒肆責難。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抗戰以來，國內大半淪陷，人口西移，學校擠於西部，故驟見其多。且青年紛紛內渡，若只重質量而使多數失學，必成嚴重之問題。故勞來而教育之，乃為教育部最急要之任務。況現在大專學校數目中，有因戰期急迫需要而開設之專科訓練班在內。以視戰後建設需要人數，瞠乎其後。不得以數量之稍稍擴充，遽指為不合理也。

惟戰後除各省已成立之國立大學應積極充實，以每省一校為原則外，其餘應參酌各地人口及中學生數量及文化水準而作合理的分配。其未有高級學校之邊省，為資開發及研究上之需要，應分區設立學院。至現在各級學校教師，俱感缺乏。戰後專科以上教員，為建設事業所吸收，恐仍感缺乏，所以派遣留學及於研究院內預儲師資，乃為必要，但未可一蹴而幾。為目前計，似可考選講師，一面由教育部聘請有聲望之中外學者，輪流赴各大學講學指導，充教師之教師，並兼任各科系輔導員。

專科以上學生訓育，除切實遵照新生活六項基本訓練外，應注重品性、態度、器識、才具及社交五項。應絕對排除黨派的暗鬥及浮囂的風氣。

第四：現在專科學校頗不發達，一因專校年限較大學僅差一二年。高中學生升學，羣趨大學而薄專科。教員亦不願就專科而爭就大學。今日多數大學，皆由昔日專門學校合併升格而成。則何不將專科學校歸入大學系列之內，而使之合一。其服務之學生，與大學練習生一律同修早晚課。可加多應修之學分。修了後與大學生一律應畢業試。但若干專科之性質，不能列入大學系統，及無須修習高等學程者，自當照舊辦理。

專科學校應多設五年制，收受初中畢業生。而在初中修業時，須施以詳密個別之測驗及擇業指導。庶幾安配得當；技術訓練，必更較進步。

第五：現行中等學校制度內，分普通中學，師範及職業三種，各分初高兩級。而職業學校，最為落後。尤以初級職校，除大都市外，招生困難，幾不能成立。良以農業社會，徒弟制猶自盛行。小學畢業後升學，多趨初中。國民生產力益轉薄弱。即此可見經濟事業之疲滯。今後各工廠及一切生產機關，應附設初級職業班，視其資本規模，

而定其招收學生之數量。至高級職校，尤應隨經濟建設之需要，隨時加以擴充。目前高級職校之不發達，尚有一種因素；即職業學校目的，在直接服務，欲升入大學，則以課程限制，不能與高中學生競爭。今後大學實科入學考試科目，必須加以調整。高職學生普通學科之程度，雖不如高中生，但其升入大學後關於技術方面之專門訓練，當較高中畢業生爲優。

普通中學課程及教學，應研究改進，已於前年四月二日中央日報星期論文中提明要點：

1. 初級中學戰後須大加推廣；課程教學，須以生活實用爲出發點，并斟酌地方需要，於三年級留出時間，設選修科目。

2. 高中因接近大學，須注重各學科本身系統的嚴格訓練，三年級應規定一部分課程分組教學。

3. 六年一貫制仍宜由教育部指定若干校辦理，以素著成績及其初中學生升學百分比高者爲限。

嘗鈞稽二十八年度統計，高中畢業生升學人數占百分之六十五。惟抗戰以來一般學校學業水準漸趨低降，先應維持原有水準，並使升學比額增高。再參酌各地大學人數之需要而爲比例的增加。且欲改進大學質量，須先改進中學質量，自無疑義。

縣立中學以培養地方幹部人才爲原則，可試行四年制課程，應照管、教、養、衛四項編配，外國語一項，應否存在，由各省教育當局視地方需要定之。並應自二年級起開始教學。（凡初級中學，外國語一律於二年級起開始修習；一年級加習國文。）其學業成績優良志願升學者，於一年級或二年級修了後，由教育廳分區考試擇送省立中學；清寒者得享公費待遇，至大學畢業。

第六：師範教育各省應有國立師範學院一所，以獨立設置爲原則。在教育尙未發達地方，則二省或三省設置一所。其屬於邊疆教育性質者，應設置邊疆學院。關於中級師範，各省向分師範區，每區有省立師範一所。今後分區，應按學童數及交通狀況重行劃分。凡學童多或交通不便地方，分區應縮小，添設師校。聞教育部已令各國立中學改設師範科或職業科以應急需。戰後除教育不發達及邊疆之省分，國立師範及國立中學並應存在以作示範外，其

餘各省每省應分配國立師範一校，具示範及實驗之作用。簡易師範應改稱國民師範，並大加擴充。

國民教育師資，四年內每年尙應產出四十萬人。據教育部陳前部長報告：就後方推行國民教育之十九省市計算，三十二年度共有學生一七、八三〇、三六四人（中心小學及國民學校合計）。按全國學齡兒童四千萬估算（參考拙著國防中心教育概觀一九九—二一一頁），則已有半數普及。（因近年統計並不齊全，且抗戰期中全國兒童之增加數遠不及損失數。）試以全國尙有二千萬未入學兒童，計分五年普及，每一教師擔任五十名，即須教師四十萬人。國民教育師資，應以女子擔任爲原則。因女性天然爲國民幼苗之保姆，亦即爲女子之天職。今後男子多被各項生產及交通建設事業所吸收，女子尤應於教育事業方面多所努力，且能發揮所長，對於國家民族有莫大之貢獻。現在各級學校師資，俱形缺乏，不得不格外遷就。爲彌補此種缺憾，一面假期補訓，須認真辦理；一面須厲行視導制度。中等學校，除充實普通視導外，尤應採用各科視導。

第七：國民教育現分二部：一爲兒童教育，一爲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之開始工作，爲開明文盲（通稱掃除文盲名義不妥故改）。查教育部曾估計全國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文盲，尙有一百四十萬人（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疊合全國教育機關及學校兼辦社教。社教事業，固極繁多，要以開明文盲爲首要之工作。現在全國大中小學學校總數共二十五萬六千所，苟每校平均擔任開明文盲五十人，又加以其他機關之合作，則文盲減至零數，實非難事。

第八：復員教育。軍興以來，因軍事上交通上金融界及各項新興事業上之需要，吸收中學未畢業學生頗多。今後必量其能力，安配於各項生產部門，施以相當之訓練。而各種補習學校，亦須亟爲規劃。抗戰壯丁退役後如不安配得當亦將成爲社會上嚴重問題。一面應由政府及社會上慰勞獎勵，設法維持；其受傷而不能工作者，自應贍給終身，保育其子女。一面應按照各人體格及能力，其能任工作而不能回復其原有之職業者，則加以相當之訓練，指導其改業，由社教主主要機關負責計劃，或專設機關辦理之。

第九：今日世界趨勢，民主國家雖已勝利，而和平局勢，尙賴武裝維持。所以教育與軍事國防，必須配合，斷

不可永久依賴他人。若因誤解民主意義，以爲學生無須參加軍訓，尙安論民衆武力，亦自趨於沒落之途。三民主義之教育，乃調和個人之發展與民族全體之生存及昌榮。教育上必須鼓勵個人自動與創造，但必須合於民族利益之途徑，爲民族服務國家利益而表現其個人之價值。教育上應培養善享自由之觀念，而無害於民族之團結；應培養守法之習慣與人類之同情；並應改革虛僞浮薄之風氣，養成沉毅堅忍之習性，是爲一般教育之要義。至於國民道德教育，當另著文詳論之。

關於中學問題：參考拙著「中學制度及課程問題之檢討」，昆明中央日報三十三年四月二日論文
關於邊疆教育：參考拙著「邊疆教育計畫大綱」，昆明建設導報第八期

中國教育的革故鼎新

周 尚

我相信世界是進步的，不循環的，故中國也是進步的，不會回頭的。戰爭鍛鍊了中國人的身心，現在已經有一個更勇敢而青年的中國巍然挺立起來，明天的進步一定大於今天的成就；在進步的過程中，不斷擴大優點，消滅劣點。這次抗戰最足以改造民族經驗與個人才性，教育者宜從而覓取教育的意義，以擴大和平的力量。

禮學記：『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孟子謂『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蔣主席在二十二年三月三日江西教育討論會上訓詞，認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第一是教育，第二是經濟，第三是武力。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梁啟超會謂：『教育為製造國民之具，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熟攷我國民族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列寧大胆曰：『給我四年的工夫來教導兒童，那末我所播的種子，就永不會給人家握去了。』〔註一〕日本教育者長田新說：『凡爾賽條約盡剝德國一切權利以去，惟教育權安全無恙，此乃德國之大幸，抑亦英法之失策。』〔註二〕美國全國教育協會維護民主教育委員會主席馬友斯說得越發透澈了：『教育對於世界和平的維持，具有極大的作用和任務。……在這次大戰閉幕時，假使和會代表只注目於軍備協定和商業協定，而忽視了教育問題，那末，我們就絕不能確保世界的永久和平。』〔註三〕

以上的言論是十足說明教育的力量。教育不是尾巴，教育是龍頭；它在創造，它在領導着國家前進。國家進步的事實，雖出於文化，而文化的根源實基於民族的思想；思想的培植惟教育是賴。最近各國教育都看透這點，他們所有教育的書刊十之八九在討論戰後本國教育的改造和國際教育的重建。

敵人的侵略固已成爲陳跡，可是我們建設的前途還是荆棘塞路，顛蹶堪虞。然而中國人吃了空前大苦辱，自該痛定思痛，居安思危，清理善後；平復瘡痍之餘，對於中國教育的建設，大家該有最大覺悟，抱最大犧牲，盡最大

努力。以前教育若非忍心粉飾，誰不惘然爲之心憂！教育辦壞了，國家民族吃不起它的惡果。

從好的教育才可產生好的國家。在這次國際戰場上，深知個人與國家的不可分，國家是一切個人的整體，個人是整個國家的分體。國家的榮辱強弱存亡，全賴個人的犧牲奮鬥。我們走的路是政治必須民主化，經濟必須工業化，世界必須大同化；中國教育必須緊跟這條路跑。我足足辦了二十年的教育行政，以前感到不滿意的地方，今後就是需要改善的地方。破壞與建設自來是並行的，沒有單只破壞而不建設。建設方面有時在精神，有時在物質，亦或同時建設精神與物質兩面。中國教育的建設該是精神與物質並重。

戰爭是一根新陳代謝的鞭子，我們要把國家變新，先要變新教育，關聯着人類國家命運和前途的中國教育問題，我們該徹頭徹尾的革故鼎新。中國教育有它世界的通性，有它本國的個性。通性與個性的教育兩者不是截然可以分開，有時後在的一得可助前者，有時前者尚未確定或未想到，後者當加以研究貢獻。中國教育應新創與重建之處頗多，第一緊要的基本問題：如本位的教育哲學尚未建立，國防的中心教育猶未成功，學校環境窳敗者多，都屬今後革故鼎新時千萬不能絲毫放鬆的。現將管見所及，略貢芻蕘於後：

一 研究中國本位的教育哲學

遜清同治初年，我們因外力逼迫，一八六二年，北京創立京師同文館，新教育由此發軔。興學的原始動機，可謂緣於對外。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閉關自守的國家，一塘靜水掀起無限風波，教育上不得不想一些方法。

新教育對於國家的功罪，論者不一，但統治階級的失職貪污，造成了內亂、外侮、外債、內債、苛稅、災害，結果民生凋敝，敵人的鐵拳打到我們的胸膛，已分明供出了教育的罪狀。抗戰時期復發現：『過去的教育與現實生活脫節，不能適應國家的緊急需要，不適合歷史的演進，不特不能守常，並且不能應變。』〔註四〕千句併一句，中國教育的大病正如錢賓四先生所謂：『中國創辦新教育……始終不脫兩大病；一曰實利主義，一曰模仿主義。』〔註五〕

這個根本弊病即是缺乏自己本位的教育哲學，沒有自己哲學的教育，就不能生根。新教育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站不住，坐不穩，經不起微風的一吹，便凋萎得可憐。

教育具有永久性，亦有時代性，故教育應注意歷史條件與時代條件，新教育要根據中國傳統思想，同時要適應時代，把握時代，更要領導時代，開拓時代。『中國民族過去的發展，有他自己的方向，他與西洋不盡同。西洋人運用心思的起點在研究自然，由自然到人類；中國人運用心思的起點在研究人類，由人類到自然。……西洋文化以征服自然着眼，……中國文化以調節人生着眼。』『結果，在西洋，物質開發已經發達，而人類關係仍欠完滿；在中國物質生活雖露貧乏，而人生關係猶感和樂。』〔註六〕

西洋教育主流不脫四派：（一）教會教育，奉行上帝意志，蔑視現世（今日這派教育已化入下邊兩種教育裏了）。（二）國家主義教育，宣揚狹義的民族主義，抹殺個人。（三）民主主義教育，是乃個人的民主主義，多為個人權利，現世享樂着想。（四）社會主義教育，正在變化，初無定型。蘇聯擁有一萬八千三百萬人口，包含一百八十二個民族，有一百四十九種語言。帝俄教育歧視民族，今則倡言「平等」「合作」「友愛」的民族政策。在馬克斯和列寧的眼光裏，社會主義也許是超越國界；可是到了史太林和莫洛托夫手裏，社會主義便和愛國主義融和了。這種愛國主義已經透過社會主義的教育文化而深種在蘇維埃聯邦人民的心田中。

我們新教育走上了模倣主義實利主義的路（事實上實利主義也是模倣來的），既不合國情，無法配合時代需要，卒造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復放棄了固有的人格修養，遠離了人性，一味在功利上翻筋斗、刀口上舐血，重物輕人，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微妙，陷入無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這回事。結果崇拜西洋，失去自信心，精神上瓜分了中國，思想上充當了漢奸，個人消滅了靈魂，國家喪失了國魂，那裏還談得上歷史條件和時代條件，配得上永久性和時代性？汪懋祖先生說了一針見血的話：

『建國教育在乎把握教育中心精神。……以往教育之失，只在學制上循環兜圈，未及研究立國之大本，自確立三民主義的宗旨以後，中國的自我精神從此復活。』〔註七〕

國家需要獨立的哲學，教育亦需要自己本位的哲學。『教育的成功，必須有健全的哲學為基礎。』〔註八〕中國是三民主義共和國，教育宗旨是根據三民主義，所以中國本位的教育哲學天經地義是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它含有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派教育的綜合性。

我們認『教育就是民生。』〔註九〕民生內容 國父指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生活、生存、生計、生命都含有杜威所說的『生長』意思。民生雖分四方面，而生活實為其他三者的總表現；蓋生存重保障，生計重發展，生命重繁衍。凡達成保障、發展和繁衍的種種行為即是生活，與西洋近世盛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恰相吻合。國父推崇大學、禮運。禮運大同一章即大學『至善』的注釋，而三民主義即至善的具體化。什麼是至善？照朱子所解釋：『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照此說法：至善是大公，是天下為公，是大同主義。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與大學綱領，如出一轍。三民主義教育哲學原取古今中外之長而去其短，是『淵源舊學』、『攝取新道』、『獨創發明』，有歷史性，有時代性，精神物質雙方兼顧，物吾並重，不但為現在且為將來，個人有自由，團體有自由，為人亦為己，不抹殺民族國家，同時倡世界大同。

『社會哲學的產生，一定是在社會有病的時候；政治哲學的產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時候。』〔註十〕中國教育現在有病了，我們應要產生像這樣的哲學。希望教育界加以研討，貢諸國家，貢諸世界。

二 實施國防中心教育

我們創造了自己本位的教育哲學，一切教育的設施，便像行路有了指南針，不致迷途。根據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即可洞悉我們這個國家是本於大公，發於至誠，而歸於求仁；決無侵略的野心，而有『繼絕世，興滅國，治亂持危』的決心。可是世界大同未實現前，我不犯人，人來犯我，又將如何？是在教育立場上，一面推進世界和平與大同之治，一面要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態度。切忌被糖衣的假和平新欺騙，重演慘劇，給予

孫再受苦難。周禮大司徒主六鄉，以鄉三老教萬民，小司徒掌建邦的教法，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教民的官職掌兵役編制的事，平時亦官之長，戰時亦軍之將。孔子所以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我戰則克』；又說『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說明教育與軍事的一貫而以保衛國家爲目的。蔣主席早講過，『一切建設必須國防化。』故今後教育的建設，務必要以國防爲中心，教育該武裝起來！

教育是民生，戰爭是毀滅，兩者恰恰相反；在教育中提到戰爭，總不免心寒；然而事實上已到了無可倖免的地步。爲生活、生存、生計、生命計，不得不重國防，好得終極目的就是達到了民生。爲民生的需要，教育非配合國防不足以適應。用教育的眼光看抗戰，戰爭是一種實際教育；用抗戰的眼光看教育，教育是一種抗戰準備。蔣主席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中，指示教育應循常規：『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這次抗戰的表現，可謂是一種血的教育，難道還打不出我們的覺悟？

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位一體，而以國防觀爲其核心。國父遺囑所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即屬此義。蔣主席於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大會開會辭中，更充分發揮此義，他要求全體國民確認國族至上和國防第一的真理，無論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要以國防二字爲衡量萬事的標準，期以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

建國必須達到絕對的國防安全，沒有國防即沒有國家。國防的要道有二：一曰經濟，一曰武力。改進農業，發展工業以求經濟上的獨立，方可求達國防上的獨立；所以教育要重科學，要重『雙手萬能』。統一戰志，充實戰備，文事武備堅凝爲一。教育要文武合一，術德兼修。武術不僅是指打槍斃技擊而言，最要者尤在運用武器的精神。武德是指『智、信、仁、勇、嚴』，古人教育的『禮、樂、射、御、書、數』，實爲現代國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修養和技能〔註十二〕。安邦禁暴謂之武，人人必須有能力足以安定社會，執干戈以衛社稷，使人畏懼而不敢犯。所以中國字造得好，止戈爲武，即是發揮能力，以禁暴除殘，志在不戰而和，與侵略國家的黷武，截然不同。精神國防與物質國防同爲重要。我們這次抗戰的主要憑藉，就在這種精神上；這種精神得之則生，失之則死。

這種精神便是國民道德。古時秦始皇造了萬里長城，中國躲在長城後面，諷笑他的敵人，他覺得萬無一失的得到保障，高枕無憂了。可是不久，侵略者從北方來，中國的敵人三次進入了長城內，敵人沒有攻打過長城，也沒有包圍過長城，他們僅不過簡單的賄賂了看城的人。這次法國用了鋼骨水泥築造了馬奇諾防線，他安全的躲在後面，但法國一度顛覆了，爲什麼？這裏發現有錯處，侵略者便乘隙而入，這個隙縫不祇在防線上，是在人民的精神上。爲了國防，爲了民族，此後國民道德教育該好好地痛下功夫。

戰後，我們中國走上世界的中國，故我們的道德該透過本國而明察世界，數十小時可跑完世界，國與國的隔閡越加淺了，這更是有新的適應以獲得新的和諧。此後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復單純是民族的一員，而直接是社會的一員；不復能隱蔽在血緣相近的舊式的互助環境的家族中。互愛互助的範圍擴大，平等民主的合作實現，個人對於一切同類的責任加重，任何一個人其作風姿態與行爲的影響，都緊緊的與一切人們相關聯。這是一個嶄新的生活，教育應爲個人準備這嶄新的生活。

三 建設良好的教育環境

教育是刺激與反應的關係。有好環境便有好刺激，有好刺激便有好反應。這裏的環境兩字特別側重於中小學的校舍。教學效率與環境是相依爲命的。兒童健康與環境有關，品性行爲與環境有關〔註十二〕。兒童是整個的有機體 (An organic whole)，有機體與環境也是分不開的統整體〔註十三〕。每種學習不特包括整個有機體，環境也包括在裏面。的確，有機體與環境兩者的關係，是異常的緊密〔註十四〕。根據都爾德〔註十五〕「一個有機體和它的環境是一個，正像有機體的各部分和各種活動是一個同樣，在意義上我們雖可辨別它們，但不能分開它們；若把一部分離開了其餘部分，我們即不能了解，且無從研究。」這是有多麼力量的說話，它們代表着有力思想的傾向。從這個觀點，學習是聯合了人類自我的有機體和環境，是一種新的親近的形式。任何一種的有機體活動，有機體的成分與環境的成分完全相同。兒童任何一種習慣屬於境遇的，同樣地也屬於兒童的。因爲習慣聯合着境遇與兒童兩者在一起。而且這

境遇是整個的境遇。它所以有特別的顯明地方，爲兒童實際所感覺的。在真正的意義上，任何重要的學習例子，總是聯合了兒童與境遇，而兒童對於境遇中無定數的許多部分是新穎的，同時境遇在無定數的許多方面再造了兒童。

陳劍恆先生有這樣一段話：『建築美醜，可能引起以下心理的及生理的反應：（一）物我的興趣是互相感應的，美學上所謂「移性作用」，即是說，物的情態可以反射於人，人的性趣亦可反射於物。……如建築校舍，有莊嚴偉大的條件，學生自然也有莊嚴偉大的感覺。……（二）物我的象徵模倣。巍峨堂皇的宮殿，常使我們發生一種崇高森嚴的感覺。……（三）對於外界刺激的生理反應，當着我們看見一座高大的莊嚴的建築時，……生理方面的眼球是向上的，全身的筋肉也是向上運動；在這時候，呼吸血液的循環，也有變動。……』〔註十六〕

中國學校的分區以及地位等並不合理，有的地方像雨後春筍的擠在一起，有的地方可憐得寥若晨星或竟一校也找不出。校舍委實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堪設想。自建的校舍百不得十而且全部不夠標準。租賃的校舍自然說不上什麼，不過比較私塾略勝一籌而已。寸金之地的都市，像上海的中心市區、南市、閘北，固不得寬敞的校舍，即在四鄉亦是侷促非凡；菩薩高高在上，小學生讀書在下，司空見慣，課室與豬欄遙遙相對的，也不算希奇。上海如此，其他更不待言。

我主張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在次一步，獨中小學的校舍不能不立即興工。日本大地震後，我剛巧在東京，看到他們建築校舍擺在建築一切的前面，令人感慨系之。東京市的各種衙署都是用草木臨時搭成，而小學校舍都撥鉅款建造。中國領事館旁邊的一所小學校舍，一化就是二百萬，普通校舍都在四十萬元以上（戰前的幣價）。回顧上海市政府宮殿式的房屋，富麗堂皇，殊不知小學生尙與豬爲伍，一在天堂，一在地獄，這是說出國人的羞恥。我們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

中國中小學的校舍至少應有下列四個條件；

第一要有廣大的體育場，

第二要有充實的勞作場，

第三要有科學的實驗室，

第四每十個學校中至少一所學校要有游泳池。

有此四條件，才可配稱爲學校。這是要化相當的錢，有人以爲不免含『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但德國教育家奈托普（Paul Natorp）老早告訴我們，並且已成德國的國策了，他說：

『國家投資教育，乃最賢明而最上算之投資。』

建設國家，重視教育，不惜大量投資，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實富豪投一毛而利天下之事。

將來對於私立學校正要費些精力加以切實整理；校舍一層，更須予以規定標準。立案時調查學校基金，多數學校紛紛在如法泡製的作假，銀行存摺皇皇然存着款項，實則牽蘿補屋，向人借來，教育行政當局何嘗不知道，不過眼開眼閉的上下相蒙而已，但其遺害則無窮。戰後私校立案的第一條件就該規定校舍，不論自造或租賃，千萬不可缺少：（一）體育場，（二）勞作場，（三）實驗室，否則基金儘管多也不准立案；二年內不得立案即予取締，豈非爲國造福，功德無量之事嗎？

陸贄講過二句名言：『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對於中國教育的革故鼎新，似亦難逃這二言。但中國教育界經過這次大時代的洗煉，應該迸裂些火花來！

〔註一〕根室：歐洲內幕蘇聯一章的引言

〔註二〕長田新：『日本教育的改造』，教育通訊六卷廿八期

〔註三〕汪家正：『提倡戰後世

界教育的研究引言』，文化先鋒，四卷一期

〔註四〕羅菊農：『抗戰七年來的教育學』，文化先鋒，四卷十七期

〔註五〕錢賓四：文化與

教育論文集

〔註六〕崔載陽：『我的民族教育信念』，教育通訊，十七期

〔註七〕汪懋祖：教育學

〔註八〕蔣主席：哲學與教育對於青

年的關係

〔註九〕姜琦：『三民主義教育哲學述要』，三民主義半月刊六卷三期四期

〔註十〕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五大演講

〔註十一〕孫德中：『抗戰與我國教育前途』

Health Education, Chap. II.

〔註十四〕Kilpatrick, William H.: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註十五〕Haldane, J. S.: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註十六〕陳劍恆：『人格陶冶與學校建築的關係』，教育通訊五卷十五期

今後之大學改制

余家菊

今日中國教育，本不受指導於理性，教育言論，祇如狂呼於曠野中，聊抒其積愆而已。往年曾刊大學改制一文於高等教育季刊，所見今仍未變，故本篇僅談三四點，以補充之。

(一) 大學肄業年限，依其科別，各縮短一或二年。

理由：(一) 大學肄業年限，受決定於全般學科在學習上所需要之時間；學科修習時間受決定於所設學科目之多少；所設學科目之多少，受決定於所欲教成之人才。大學所教成之人才，第一在使其享有高等文化之素養，第二於其欲走入學術研究途徑者，使其窺知某一學科之根源，而於其他學科，則僅了解其大要可也；對於欲從事專門事業之人，使其於某一方面具有設計能力，於其他方面則僅具有應用技能可也。大學不能教成百科全書，出大學後不能棄書不觀，而望其知識永久足用；且大學生出校後，在各方面，都祇是居於助手地位。故有許多學科可減少其內容或根本廢棄，故修業年限可以縮短。(二) 國家的財力，人民的經濟力，皆宜於在可能限度內，儘量縮短肄業年限。(三) 每級學生，於離校後，入社會時，都須經過一個學徒時期，如果年齡太高，則學徒自處困難，而收效小。(四) 大學年限過長，使女生到廿六七歲後，始安心結婚，於國民健康及人口繁殖，皆障礙甚大。

辦法：(一) 小學廢初小高小之別，合為五年畢業；中學仍舊六年，以便於高初中分別設置；大學各院系，分別縮短一年或二年。(二) 擴充研究科，增高研究生津貼，大量選拔研究生，以促進學術。

(二) 大學經營應適應地方情形。

理由：(一) 大學的研究，須注意其環境情形及其當地問題。(二) 大學所培成之人才，須適於當地之需用。(三) 中國邊境遼闊，情況複雜，各地大學決不可同規一轍。

辦法：政府對於大學之要求，當限於極必要的少數項目，且儘量出以具有彈性的規定，使西康大學不必與哈爾濱大學事事從同。

(三) 創立女子學院以養成新女性，使作婦女領袖。

理由：(一)今後婦女獨立活動，需要婦女領導，故當培成女性領袖。(二)男女氣質不同，所受人文熏陶不宜一律，亦不宜用同一教法。(三)健全的婦女風範，須具培養鼓鑄之處。

辦法：女子學院教授文學、歷史、生物、化學、教育、美術等科目，可酌量分組或分系；其目的在養成社會服務者、婦女領導者、兒童保育者，以及家庭之主婦。至學術程度，則保持一般大學之水準。

(四) 發揚愛真心，以推進科學。

理由：(一)今日中國需要科學以建國。(二)科學是人心產物，人心墮落，不能產生科學。(三)科學是真理的體系，祇有人人能坦白說出其見，始為具有培育科學之環境。(四)說真話，不至冒犯危險，人們始肯說真話。

辦法：(一)肯定講學自由，教授見解祇屈伏於理性之前，不受外在的干涉。(二)教授不犯罪。教授以講說與思想為職務，在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時代，教授不能以教授身分而犯罪。(三)教授職務當有保障。今日大學行政人員，大體都是權貴鼻息之仰承者，教授之進退，不可置於此輩之手。其適當辦法，祇有由校長將其所欲辭退之教授，提交教授會投票決定其去留。

以上四點，與建國前途關係皆甚重大。謹略舉理由與辦法要領，以就正於大雅之前，恕不及詳言之。

今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新動向

黃 溥

凡研究過我國教育史的人，大都曉得我國歷來有大學。朱子的大學章句序有以下的幾句話：『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子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大學制度在周曰辟雍，又曰上庠，後來通稱太學；自隋至清末又稱國子監。它的用意與今日的大學相類似：有學生，有教官，有學科，有積分方法，有入學資格，有學位；它的組織也很像今日的大學。不過我國今日的大學決不是由歷史上的太學、國子監所演化出來的，乃是與歐美文化接觸後，漸漸的模仿而來的。我國現代大學教育的開始是在前清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管學大臣孫家鼐開辦京師大學堂的時候。以前雖有同治元年的京師同文館，以及此後各地陸續設立的方言、船政、海陸軍、時務、鐵路等學堂，不過都是專門教育，對於以後的大學教育影響極少。

我們在提出這次大戰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新動向以前，必先知道在過去我國大學教育有些甚麼重要的變遷。自從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開辦以來到現在，我國大學教育爲時不過四十六年。在這四十六年中，重要的變遷有以下三類：

一、大學制度的成立：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張百熙爲管學大臣，奉命編訂欽定章程：大學三年，分政治、文學、格致、農學、工藝、醫術等科；預科亦三年，分政、藝兩科。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編訂奏定章程：大學制度仍舊，惟加經學科；醫農四年，預科仍三年，分三類。民國成立後，大學廢經學科；除醫科、法科四年外，餘仍三年畢業；預科三年，分三部。

二、大學制度的修正：民國六年公佈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之需要爲宗旨。大學本科四年，分文、理、法、商、醫、農、工等科；預科二年，不分部。凡設二科以上者，始得稱大學，設一科者爲某科大學。民國十一年大學採用選科制，廢除預科，大學設數科或一科均可。國民政府成立後，於十八年頒布大學組織法；同年教育部公佈大學規程。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各學院。修業年限，除醫學院五年外，餘均四年。凡具備三學院以上者，始得稱大學，不足者稱獨立學院。民國廿三年教育部公佈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廿四年國府公佈學位授予法。至此大學制度始穩定。

三、抗戰期中大學教育的改革：我國大學教育自興辦以來，發展甚速。在抗戰發動以前，大學共四十二所（國立十六，省立七，私立十九）；獨立學院三十四所（國立五，省立八，私立二十一）。抗戰開始後，受暴敵摧殘最烈。校舍設備多爲敵人強佔或受摧毀；其損失按教育部廿八年的估計，約達四千萬元。遷移後方的員生，流亡轉徙，不遑甯處；而設備欠缺，圖書損失，教學與研究多不易進行。精神上的損失尤不可以數字計。這種學術文化上的浩劫，可謂中外古今空前未有。但是中央政府竭最大的努力，維持大學教育，設立登記與貸金辦法，救濟教員與學生。抗戰以來，大學及獨立學院的校數與學生數，不獨不減少，反而逐年增加；一切設施，不獨不緊縮，反而有相當的擴充。抗戰期中大學教育最大的改革，當推課程的整理：廿七與廿八年中陸續公佈大學文、理、法、農、工、商各學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及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等。這種課程的整理，雖然不能盡滿人意，但也是一種重要的改革。此外關於大學教育的改革，還有廿七年所頒佈的導師制綱要，廿八年所頒佈的大學行政組織補充要點，廿九年所頒佈的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與聘任待遇等規程，及大學學生學業競試辦法；又於廿九年成立學術審議委員會。

以上是我國大學教育自興辦以來的大概情形。據教育部最近的統計，三十二年度第一學期，全國大學共四十所（國立廿二，私立十八），獨立學院四十八所（國立十六，省立十三，私立十九），全國大學及獨立學院研究所共六十九所，全國大學及獨立學院院數共一百九十八，學系數共七百三十三。三十一年度全國男女大學生共五萬零五

百二十八人（師範學院學生數不在內），畢業生共六千八百九十一人，全國大學教員共五千九百四十五人，獨立學院共二千一百八十四人（職員數不在內）。根據上面的概況與統計，我們可以說我國大學教育的規模不可謂不大，基礎不可謂不穩。在此艱難困苦的時候，大學教育不惟不因各種障礙而停頓，反而繼續的推進，將來我國大學教育，因建國的種種需要，必定發展，必定擴充，這是毫無疑義的。在過去我國大學教育一切進行的目的，可以說在鞏固大學制度的成立，健全它的組織，調整它的設施。在這種草創建立的時候，當然免不了有模仿人家的地方，有不合國情的地方，也有只重形式不顧實際的地方。不過從大體上說，我國大學教育已有相當的根柢，已有可觀的成績。我們的問題不是我國大學教育在戰後能否發展、擴充，而是在戰後應往何方面發展、何方面擴充。換一句話說，我們的問題是戰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甚麼新動向？這個問題對於今日從事大學教育的人，與今日國內男女大學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作者不揣冒昧，對於這個問題發表個人的意見，以就正於關心我國大學教育者。

第一種新動向：大學教育的責任應從狹窄的「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擴大到保障世界人類的文明，與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民國十八年，國府公佈大學組織法第一條「大學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可說是古今中外大學教育的傳統責任。大學照過去許多中外學者的論調，應當是一種與世隔絕，不染塵囂的研究機關。它的原意本為教者與學者的總會。拉丁文所謂 *Universitat Magistorum et Scholorum*。它是以師生共同研究為歸宿；它的精神寄托在圖書館、實驗室與研究所；它的中心在學術；它的一切研究不必與社會發生關係。孫曉樓先生在教育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七號發表「當前改進我國高等教育之商榷」一文，其中指摘我國「前半期的高等教育，是以師儒訓導，作經典考據，墨守舊法，一切惟我獨尊。」美國布朗大學校長 (President Wriston of Brown University) 在他著的 *The Nature of a Liberal College* 一書中，明說：The College must be a cyclone cellar, or place of retreat, quiet, rest, and thoughtfulness apart from the hurly-burly of the market place and business. In other words, the college must not become a service station. 這種大學教育我們可以給它一個尊號，名之曰象牙塔的大學教育。這種見解

的大學教育，照作者的管見是不合符我國戰後的情形與世界的大勢，我們須知道這次世界空前的浩劫，人人犧牲，人人吃痛，到底「所爲何來」？我國八年多的堅苦抗戰與同盟國家聯合作戰，到底是一回甚麼事？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我們的目的在打倒軸心國家後，建立世界的新秩序。要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必須要保障世界人類的文明，與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我們還要知道這種偉大的使命，不是靠打倒軸心國家的武力與軍事可以完成的。要完成這種偉大的使命，「必須以教育的力量，在全人類心理上建設一座永遠的長城，才能祛除戰爭的因素。這種心理的建設，是今後全世界教育家的最大任務。」（陳立夫：教育上應有之新動向，見中等教育第一卷第五期。）也是今後全世界大學教育的最大任務。戰後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象牙塔的大學教育，而是瞭望台的大學教育。所謂瞭望台的大學教育，就是以世界的眼光來研究世界的問題，摒除一切種族間的成見，消滅國際間的仇恨，共同努力在學術上、發明上、研究上，來促進世界大同。這就是作者認爲戰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第一種新動向。

第二種新動向：大學教育應注意整個人格的修養，不應偏重智力的鍛鍊。中西大學教育向來偏重智力的鍛鍊：在英美有所謂 *Mental discipline or intellectualism*。在德國有所謂 *Die Geistesbildung oder die Geistesgymnastik*。這種理論是以大學唯一的目的在鍛鍊智力；智力一經鍛鍊，一切訓練皆可解決，學生便可畢業問世。鍛鍊的方法，在外國就是熟讀古典文，研究 *Plato, Aristotle, Thomas Aquinas* 等；在中國就是熟讀十三經，學做八股文。於是乎教育變爲讀書，讀書即是教育。大學讀大書，小學讀小書，祇有書獃子才可受教育。殊不知這種智力鍛鍊的學說，以官能心理學 (*Faculty psychology*) 爲根據，早已爲現代心理學家及教育學家所打破，早已不能成立；而一般從事大學教育的人，尙執迷不悟，造成「教育就是讀書，讀書就是舞文弄墨，在文字和書本上用工夫；讀書的結果，便是做特殊階級，只勞心不勞力，多享權利，少盡義務。」（章柳泉：現階段中等教育的批判及應有的轉變，中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我國古代大學教育，據朱子的大學章句序，是「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我國書院教育，也講究氣節的訓練，如明朝的東林書院，與奸臣魏忠賢對抗，重氣節不重利祿。我們看今日的情形如何，大學畢業生充任漢奸的，大有人在，這是甚麼緣故？照作者看來，我們不能不說是過去大學教育只

重智力的鍛鍊，忽視整個人格的修養所致。戰後我們要整頓大學教育，改善大學學風，非注重學生整個人格的訓練不可。關於這一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Dean Hawkes 在他的一九三七年的報告書中，闡述得非常透徹，他說：“The whole man is admitted to college, and the college accept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knowing and offering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aspect of the individual, just so long as he seems to be educable at the college level.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ntire personality of the student, his mind, temperament, emotional and physical make-up and ethical attitude, each and all present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This principle accounts for our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 of social events, of sports both intercollegiate and intramural,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our liberal attitude toward all sorts of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Whole human beings have all of those vital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蔣主席在他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提出『制度要歸本於民生，技術要為人生服務。』大學教育應以全力訓練學生整個的人格，養成他們以服務人羣為終身目的。這就是作者認為戰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第二種新動向。

第三種新動向：大學教育應造成學術研究的自由風氣，使教授與學生對於世界文化，能作最大與最多的貢獻。這次大戰以後，世界將成爲一種甚麼樣的世界，誰也不敢預測，誰也不敢逆料；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拿得穩的，就是民本主義的抬頭，與獨裁主義的衰落。民本主義最要緊的一種因素是甚麼？就是自由。自由是一種最易被人誤解的名詞，我們所謂自由，不是指放縱的行爲或不負責的舉動而言；我們所謂自由，是指各人有機會充分運用智慧與經驗來控制各人的行動而言。這種自由，英美人所謂 Freedom through intelligence，對於學術的發展，與人格的修養，是絕對不可少的。這種自由是大學教育的維他命，也是人類文化的生命素。這種自由一經喪失，人類文化沒有不遭打擊的，大學教育沒有不一落千丈的。試看我國的學術史，在春秋戰國時代，思想的解放，與諸子百家的學說，何等的輝煌騰達！一至漢武帝用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於是我國學術的發展受莫大的打擊。再

看世界大學教育以前辦理最善，成績最佳，舉世受其賜的，要推那一國的大學教育？我們可以不加思索的說，是德國以前的大學教育；因為，在十八、十九及二十世紀的初葉，德國的大學努力提倡學術研究的自由。德人所謂 *Lehrfreiheit und Lernfreiheit* 英美人所謂 *Academic freedom*。誰知一旦希特勒登台，國社黨得勢，用獨裁政治將大學學術研究自由的空氣消滅得乾乾淨淨，將有名的學者與教授都放逐到英美各國；遂使德國大學的國際地位，一蹶不振。戰後我國的大學教育應盡力培養民本主義的精神，造成學術研究的自由風氣。在過去與現在，教育當局對於大學教育未免過於統制，過於整齊劃一。當然在草創時期與抗戰時期，這種統制的現象也許是出於不得已的，是情有可原的。不過今後，我們大學教育漸上軌道，規模已穩，基礎已固，我們就不可不提倡學術研究的自由，使教授與學生共同尋求真理，對於世界文化作最大與最多的貢獻。這就是作者認為戰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第三種新動向。

第四種新動向：大學教育的程度應盡量提高，增加研究的年限一年或二年，頭二年的課程併入高中辦理。上面作者所提出來的大學教育的三種新動向：擴大大學教育的責任，注意整個人格的修養，與提倡學術研究的自由風氣，若是沒有第四種新動向與之相輔而行，則不能有成功之可能。第四種新動向即是大學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學程度若是太低，根本就不學，還談甚麼擴大責任、修養人格與自由研究。近年來，國內大學，無論國立與私立，都感覺學生學業程度遠不及抗戰以前的程度，教育部也承認「各專科以上學校質量上的發展，尙未盡能與數量上的發展相應合。」在抗戰期中，中學畢業生程度的低落是意中事；學校與學生輾轉遷徙，設備不全，生活不定，教師不安於教，學生不安於學，結果只有敷衍了事。好在這些困難以後可以一一解決，同時教育部關於大學程度的提高，已擬出種種辦法：如嚴定大學教員的資格、聘任、待遇及保障與進修等辦法，整理大學課程，編訂大學教本及參考書，切實充實圖書儀器的設備，嚴格考核學生學業成績，舉行各種競試及論文比賽，辦理統一招生及提高文科招生標準等。這些辦法當然可以多少提高大學教育的程度。不過照作者的意見，這些辦法還是不澈底；因為現在的大學教育，不管怎樣改善，它的頭二年的課程是準備學生做高深研究的課程，是屬於中學教育性質的。既然大學

頭二年的課程是屬於中學教育性質的，爲甚麼不將它歸併中學辦理？同時四年級的大學生，對於自由閱讀與研究方法，略窺門徑，即準備畢業，這豈不是笑話？所以必須延長修業年限一年或二年，使學生有比較充分的時間，作高深的研究。這就是提高大學教育的澈底辦法。這種辦法在英美已有採用的趨勢；在英國中學學生通過 School Certificate 考試後，如欲升入大學，還須仍在中學補習兩年；在美國已有初級大學（Junior college）的設立，與普通教育的運動（The 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一時全國雖未通行，然提高大學程度的趨勢與辦法，已見端倪。我國戰後大學教育程度，如欲澈底提高，非將頭二年課程併入中學辦理，同時增加研究年限不可。這是作者認爲戰後我國大學教育應有的第四種新動向。

今後我國大學教育應加改革之處頗多，應有的新動向也不止以上的四種，不過作者認以上的四種爲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動向。今後我國大學教育不謀改進則已，如要改進，非採取這四種動向不可。當然這四種動向不是馬上可以做到的，必需相當的時日與相當的準備，才可成功。因爲大學教育的改進，不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問題，也是中等教育與初等教育改進的問題。所以戰後我國大學教育的改進，異常複雜，異常困難；但是這種複雜與困難的工作非着手進行不可。

高等師範教育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之途徑

艾偉

中央大學師範學院畢業同學會成立大會講稿

畢業同學諸君：關於國內高等師範教育，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在行政方面雖祇負了六七年的責任，而在學術研究上却自始至終未嘗間斷。所以對於學術與行政二者宜如何作有效的配合，始能克服當前師範學院中所發生的種種困難，我是有資格講話的。猶憶二十年前，中學改制，成爲初高的三三兩級，在師資方面水準亦應提高，於是國內六區的高等師範都紛紛改升爲大學，預備養成高中師資，以應需要。同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中多國外著名教育學者如孟祿博士杜威博士等）資助這些由高師新改升的六大學設立科學講座，其目的在尋求科學事實，以改進高中自然科學的教材和教法。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爲接受此種講座者之一，其科目分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和教育心理五門。在這五門中，本人則負教育心理研究的責任，其目的在根據心理學原則或應用心理統計方法以研究中學各科教學法。這就是學科心理的研究，所以我在大學裏放棄一部份純粹心理學的講授，轉而探討學科心理的問題，是受中基董事會的委託，以應高師改制後需要的。講座制度施行以來，其教材研究工作的進行，並未能如董事會諸公所預期，因爲理化動植四教授，原爲科學專家，他們祇知道在實驗室裏應用儀器以作純粹的科學研究，對於高中教材的心理研究，很少顧到。於是董事會中在設置科學講座的目標中乃另加一條，就是不研究自然科學的教學而作純粹科學的研究亦無不可。在這個當兒，目光遠大的教育學者如鄭曉滄孟憲承諸先生，對於董事會之妥協辦法，都認爲在高等師範教育上影響甚大，爲圖補救起見，乃仿美國哥大師院辦法，於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中成立教育心理學系，由本人主持其事。於是決定方針，分配課程，希望在數年以後，培養成一種既能擔任專科教材又能研究合乎心理的教學法的雙料人材。教育心理系剛畢業的學生，在能力上雖不一定能擔負此兩種任務，但在興趣上他們是

趨向這兩方面的。這般畢業生於服務數年之後，如再往國外從事深造，則現在師範學院中擔任各專科教材與教法的教授的來源，自不成問題了。在民紀二十一二年的時候，科學講座的制度既經廢止，而教育心理學系又被歸併，這在高等師範教育的學術研究上實在是一種重大損失。但是這樣的損失，從當時一直到現在，又有幾人真能見到呢？

抗戰軍興，師院制度成立，這在表面上可算解決了高等師範教育問題或中學師資問題，但是在實質上，這問題非但未能解決，且加添了幾項嚴重的問題，如各系課程問題，師院獨立問題，畢業生服務問題等。這些都是最明顯的。至於嚴重問題中之最嚴重者，如師院本身的教材教法專家師資一問題，則仍嚴重的存在着。同時院長人選不盡健全，因此風潮迭起，更易頻仍，所謂師表，居然作法自斃了。關於課程問題，簡單的講，師院各系中幾種必修的教育科目，讀了以後，仍是隔靴搔癢，於教法改進上毫無裨益。又如基本的工具科目如測驗學統計學等，則除教育系定為必修外，其他系科竟付闕如，致使一般師院文理各系的畢業生於教育科學化問題，尚不如師範學校的畢業生認識得清楚，甚至各種教育刊物上的論文有三分之二以上不能讀懂，這是多麼可憐的一件事；這樣，怎麼能使一般師院畢業生對於教育研究感覺興趣？尤可笑的，是大學中文理學院各系的豐富科目，師院學生祇能過屠門而大嚼，禁止選讀，使青年們心理，對師院設置，感慨萬端。假使師院是獨立設置的話，這些情形可以避免，但是獨立設置的理由若以此為根據，則又未免因噎而廢食。因為同在一所大學中，文化修養自覺便利。關於服務問題，畢業生則避之若浼，出乎行政當局所預料。轉過來講，工學院和師範學院一樣，因為專業訓練的機關，何以機械系或化工系畢業生，雖無服務年數之規定，反不開他們對於專業服務，有避之若浼的情形。足見現在師院當局之措施，與受訓學生意見相左，心理上完全不同。這不同的原因，顯而易見的，是學生們多少受了專科教授甚至系主任的催眠；因為有些教授甚至系主任對於教育學術修養欠深，甚而至於從未涉獵過，故對各系學生之修習這些學科，每有忽視之態度，以為可有可無。此種事態，至可注意，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根本與設置師院之本意相違。心理不同的另一原因：則為教育教授甚至系主任，當其講授是科之時，對非教系學生往往語焉不詳，以為他們「能是，是亦足矣！」所學既不在專，何必求其甚解？這樣的態度在學生心理上易起不良的反感。轉過來講，恐怕還要嚴重些，

就是非教育系學生所選讀的教育功課每由二三流人員所講授，使學生聽了興趣索然，以為所謂教育學科的內容原來如此，似大不如他們所選的本系學科如物理或化學、歷史或地理等的方法謹嚴、內容具體；而的確有其科學價值。從此，他們對於教育就看輕了。就這兩個心理原因看來，無怪乎學生們不樂於服務教界而終身其事。

轉過來講，工學院畢業同學之所以樂於服務工程界，亦自有其原因，就是工學院的基本知識在理化等科，必理化各門有了基礎而後講求工程上的應用。純粹科學在先，應用科學在後。二者配合，相得益彰，乃自成一研究的系統，終身作之，興趣益濃。師院學生則不然，部中所規定的必修教育學程多半內容廣泛，成爲一種知識之傳授，並非基本的工具學科。讀了以後，對於本科教學既仍是隔靴搔癢，二者不能溝通，興趣自覺索然。假使師範學院設有教育心理系，一方面培植教育心理系本身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則開設實驗心理測驗統計等基本的工具學科，一如理化等系所開之基本理化學科然。這樣，則師院各系畢業生於本系專門科目而外，獲得有研究各科教學的工具，自知其崗位所在，終身以之，其興趣自益然了。所以欲解決當前的師範教育問題，除院系主持人之態度改正外，應請行政當局注意下列數事：（一）就各國立師範學院設立教育心理學系，聘請專家主持其事。（二）在各師院中，由教育部恢復前中華文化基金會的科學講座制度，聘請富有專科教學經驗而對教學感興趣的教授從事中學各科教材的心理研究。（三）分年組織各科教育研究委員會。由大學各科有經驗之教授與辦中學而有成績之校長及教育心理專家擔任委員，從事關於某一科目各方面之研究（這在美國是常有的事，如中學數學教育研究委員會、中學國語教育研究委員會等是）。（四）院長人選應經慎重考慮而後提出。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在現在辦師院，不但經師不易得，而人師則更難求，高等師範教育之所以未見普遍的辦好，這似爲原因之一。

抗戰結束，建國必須積極，建國之中，以建教爲首要，而建教之中，又以建立師範教育爲首要。所以今後對於師範教育的設施，既應迎頭趕上，必須急起直追。我個人乃本二十年來從事高等師範教育的經驗貢其一得之愚，藉作政府勵精圖治之參考，亦所以指引一般畢業同學一條在使命上所應前進的大道。

關於吾國高級師資訓練幾個重要問題

中國教育學會
西北分會

關於吾國高級師資訓練的問題，當然很多，惟其間不無輕重之別。謹就其重要者，提出六個以就商關心於吾國高級師資訓練者。吾國高級師資訓練機關，自成立（光緒二十七年京師大學堂之師範館）迄今（現在之師範學院）已有四十餘年之歷史，變更不下八九次。每次變更，在當局者固力求其完善，偶以考察未周，或思慮稍疏，即不免呈露其缺陷。以下所討論之題，即欲補救其缺點者也。

一、訓練的目的 目的爲一切事業成功之本，目的切實而正確，則事半功倍，否則反是。師範學院之目的，按師範學院規程第一條爲：「師範學院以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養成中等學校之健全師資爲目的。」與前北平師範大學所定之目的：「1.訓練中等學校師資2.培植教育行政人員3.養成教育學術專才」相較，顯有缺陷。蓋以師院畢業生不盡爲中等學校教員，如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之工作，亦需人擔任；且師範學院成立後，各大學之教育系已漸次取消，而教育學術人才之培養則責無旁貸也。第三屆高級師範教育會議時，雖曾經修改爲「師範學院以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養成中等學校健全師資並研究教育學術爲目的」，然未能顧及教育行政人員之培養。試問辦教育行政的，如督學、科長、局長等，是否需要訓練？據國聯教育考查團批評吾國教育行政機關之人員有云：「此種人員所受之訓練，實不足以應付其工作，且缺乏創造力。」可知教育行政爲一種專門事業。美國各大學不僅單獨成系且設有專科，以訓練局長、督學等。故從事斯業者非僅憑經驗即可，必受有相當訓練方能勝任也。教育行政人員既需要受訓練，而訓練場所，當然是師範學院。觀師範規程第四十三條：「師範學院每屆畢業生，應由院校將學生品行學業各項成績呈報教育部，由部分發各省市充任中等學校教員或教育行政人員，」可知矣。惟教育部承認其資格而不明定其目的，在規程上固欠完備，訓練上亦嫌忽視。故高級師資訓練之目的應改爲：「師範學院以

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訓練中等學校健全師資，培植教育行政人員及養成教育學術專才爲目的。」

二、機關的名稱 應稱爲學院抑稱爲大學？一般的俗見都認爲學院不如大學高。往年會有這樣一件事：一位學生家長對他的學生講，若能考上大學就供給學費，否則不供給；結果學生考取了某學院，家長以爲非大學便不供給學費，豈非笑話。查「大學」一詞，乃源出於拉丁文 *Universitas*，意義爲無所不包，在英文即爲 *all together*，*the whole universe* 之意，如用於教育上，爲研究高深學術及授予各種學位機關之意（*An institution organized for teaching and studying in the higher branches of learning and empowered to confer degrees in several departments, as theology, medicine, law and arts*）。「學院」則拉丁文爲 *Collegium*，英文意義爲 *Society*。在教育上爲研究高深學術之社團或某種學業訓練之設置（*A society of scholar, of friends of learning, is cooperated for study or i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hig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or an institution for special instruction, usually of a professional, kind, as college of theology, business college*）吾人據此以較二者之意義，可有二結論：

(1) 無論大學或學院，均係研究高深學術機關，並無高低之別。

(2) 大學是無所不包，學院爲將性質相近科系組成之專業訓練機關，如農、工、醫等。

認清二者意義之後，再看今之師範學院是否由性質相近之科系組成？就師院所設之系論，若按其性質相近者而組合之，至少可分爲教育學院（包有教育系、公民訓育系、體育系），文學院（國文系、英文系、史地系），理學院（數學系、理化系、博物系），況又有家政系、藝術及勞作等科乎。再進一步言，職業學校師資應由何處造就？師範學院似亦不能辭其責。如此，其性質與大學之無所不包者同，非如農、工、醫等學院之單純者可比。與其稱師範學院，不如稱師範大學，此揆諸理論與事實均無不合也。或謂外國亦稱師範學院而不稱師範大學，我國何嘗不可從同？其實吾人但應問名實相符與否，不應問外國有無此辦法也。（且美國伊利諾省已有師範大學 *Normal University*。）從前稱爲師範大學是較有見地的。

三、存在形式 高級師資訓練機關應附屬於大學抑應單獨設置？按師範學院規程第二條：「師範學院單獨設

立，或於大學設置之，得分男女兩部，並得設女子師範學院。」是單獨設置或附設於大學均無不可也。第二屆高級師範教育會議時有人提議：「大學師範學院應分年獨立設置」，經決議：「師範學院以獨立設置為原則」，是側重於獨立設置也。全國現有師範學院十一所，獨立設置者有六，附設於大學者有五，事實上亦漸趨於獨立。惟尚有少數人為經濟人才着想，而仍主張附設於大學者，是不可不辯。高級師資訓練機關規模之大，包容之廣，已如上述，絕非一教育學院或一教育系所能改成，附設於大學內，縱經費、人才、設備等問題可以勉強應付於一時，其他根本問題，仍未能解決，茲分述如下：

(1) 儒家氣節 師資雖為一種職業，然與其他農、工、商等不同，蓋以前者直接為國家謀利益，間接為個人謀幸福，後者反是。從事於斯者（精神國防）與海陸空軍等，非對國家民族有濃厚的愛情（成仁成義的精神），個人立身處世有大丈夫的氣概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能勝任而愉快。但此種厚愛與氣概必須有特殊環境始能造成，若附設於大學，恐將被重視物質享受者譏為傻瓜、窮酸或書癡矣。

(2) 專業精神 教育為一清高事業，欲從事於斯者始終以之，不見異思遷，必須對於教育有崇高之信仰，對於所學有勤奮的努力，對於教人有不倦的態度而後可。但此種信仰努力及態度，非有特殊環境不足以養成。

(3) 課程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師範學院附設於大學最充足的理由不過遷就經濟人才及設備等條件而已，若遷就此項條件而使其效率降低，未能達到原定目的，必為善權衡輕重者所不取。師範學院所定之科目與大學文理等學院所定者，名稱雖多有相同，然因目的各異，其教材教法絕不能強合，以其需要專業化也。若附設於大學師範學院之科目，除教育系者外，勢必依照大學各系原定目的而講授，則師範學院成為犧牲品矣。

根據上述理由，吾人主張師範學院應絕對獨立設置，勿因小忽大。現附設於各大學之師範學院，亦須逐年使其獨立。

四、訓練年限 訓練年限究應為五年或四年？師範學院規程第五條：「師範學院修業年限五年滿期考試及格，

並由教育部覆核無異者，由院校授予學士學位，並由教育部給予中等學校某某科教員資格證明書。」主張五年制者其理由如下：

(1) 專業訓練機關所培植之人才必須專精，否則不能達到訓練目的，如歐美之醫、工、法等學院之肄業年限均較普通大學為多。師範學院為一專業訓練機關，故年限亦應長。

(2) 就中等學校師資之訓練言，英、美、德各國亦較普通大學為高：如英國為四年大學卒業後再受一年練習及訓練；美國各聯合會所定中學教師標準多為大學畢業後，再受一年專業訓練；德國大學普通為三年，欲充任中學教員者，則為四年，畢業後考試及格尚須實習二年。

(3) 高級師資訓練之目的在造就教育者（或教育家），非僅為教書匠。專業專門及修養（或基本）等科目，須兼顧並重，非有長期訓練不足以達此目的，故修業年限應較長。

主張四年者之理由：

(1) 專業人材訓練之年限，除醫科外，不一定均較普通大學為長；如德之法科，英之工科，肄業年限與普通大學同；中國工、法學院亦復如是，高級師資訓練，又何嘗不可縮為四年？

(2) 高級師資訓練制度，在英、美、德三國分為二段；第一段為專科的（大學部），第二段為專業的，與吾國師範學院之二部同，未能與正規訓練比。且此種學徒式之訓練早為識者所不滿；以其在大學時所習之科目過於深狹不適合中等學校之需要，在練習時指導教師多為舊習慣及思想所支配，不易有進步也。各國目下尚有未盡滿意之辦法，吾人更不必引以為例。況美國亦有四年制之師範學院，日義之高級師資訓練機關均為四年，法國之高等師範僅為三年乎？故吾國高級師資訓練年限定為四年，尚不為短。

(3) 對於高級師資之訓練，因專業專門及修養等科目兼顧並重，需要長期訓練，在理論上當無異議。然吾國經濟狀況（國家個人兩方面）是否較法、義、日為優？教育條件能否在四年內達到，均不能不熟加考慮。若證以北平師大之經驗，四年制之訓練，當能達到規定目的。據蕭季英君之調查：中等學校教員服務年限最長者，為師

大畢業生，報酬最多者亦為師大畢業生；服務年限最長，證明有服務精神；報酬多，證明服務的成績優良。故四年訓練，亦能完成訓練目的。

(4) 抑尤有進者，訓練目的能否達到，年限非惟一因素，學生選擇、課程組織、教學效能均有關係。西北師院附中歷年考大學之成績，為全國冠，並非因年限長，實為選擇優良學生，課程組織不浪費，教學效能較高所致。法國高等師範課程之高，為世界所公認，而訓練僅三年。中國四年制之高級師資訓練，較法國尚多一年，有何不可？

兩者之主張以後者為勝，故吾人主張縮短為四年。

五、劃分區域 高級師資訓練機關之設置，必須根據需要，需要之估量，不應僅限於現時，尤須顧及將來。人口、文化、交通、經濟等，雖同為估量此需要之因素，但以此等因素正為相關，若無適當原則以統馭之，勢必發生榮枯不均之弊，即發達者愈發達，落後者愈落後也。高級師資為各省中等學校之普遍需要，與農、工、商之帶有特殊地方性者不同（如江西陶器西北皮毛等）；機會均等，將來發展，應為適當之原則。故人口因素應佔首要地位。其他只可酌情度勢，為相當之配合而已。謹本斯旨，將高級師資訓練區域劃分之如下：

師範大學區	校址	人口數 (千單位)	二十五年 度之 中等校學生數	平均發展 下應 有之中等學生	超過數	不及數
一、遼吉黑熱遼寧	綏北平	三九、三四六	四三、八八三	四九、三七九	四、八二一	五、四九三
二、冀魯察綏	北平	六四、〇〇五	九五、一四七	八〇、三二六		
三、晉陝甘寧青新	蘭州	四〇、五三九	二四、四二三	五〇、八七六		二六、四三三
四、川康西	成都	六〇、六二〇	六三、七八四	七六、〇七八		一二、二九四
五、蘇	皖南	五九、八四一	一〇九、二七一	七五、一〇〇	三四、一七一	一六、〇七八
六、湘黔	貴陽	五九、六三四	五八、七六三	七四、八四一		
七、豫鄂	武昌	五七、二六六	六七、六九一	七一、八六九		四、一七八
八、粵桂	廣州	四六、〇七六	八七、五二八	五七、八二五	二九、七〇三	
九、浙贛	南昌	五一、〇三九	六四、五七一	六四、〇五四	五七一	

說明：(1)人口數係根據內政部調查與估計(見教育部二十二年全國高等教育統計表之「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籍貫、人數與各省人口之比率」)。(2)按二十二年度教部所編全國中等教育統計，每一萬人中得受中等教育的人數全國平均為二·五五，所謂平均發展下之應有中等學生數，即以一萬除該區之人口數再以一二·五五乘之所得之數也。(3)川、康、西藏一區之六三、七八四中等學生數，西藏學生未包括在內，以其無法調查也。(4)在人口數項下，上海、北平、青島等市之人口，分別併入蘇、冀、魯三省內。(5)在中等學生數項中，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威海衛的學生數併入蘇、冀、魯三省內。(6)中等學校學生數，採二十五年年度，不取最近之統計者，以其有正常性也。(7)三四兩區對於蒙、回、藏各族之特殊情形，應格外注意。

六、副科或輔系的設置 關於此點，爭持最烈者，厥為教育、史地、理化三系，茲分述之：

(一)主張不設副科者

(1)「二十八年各師範學院學生總數共一、六七〇人，而教育系五五五人，約佔全數三分之一。如果教育系能以其他一系為輔系，教育系人數勢必更為激增，其他各系主修人數，相形之下，必更寥落，結果會招致過去教育學院造就教育方法特長而非專門學科教育的危機。」(朱師述，教育雜誌三十一卷第九號)

(2)就中學與師範課程論，史地在初高中各十二小時，在簡師十二小時，在師範歷史八小時，地理六小時；物理化學在簡師與師範各六小時，在初中各六小時，在高中各十小時，規模較小之學校，如僅有三班初中、高中、簡師或師範，均不能聘物理、化學、歷史或地理任何一科之專任教員。為顧全事實計，故理化與史地應不分主副科，而兼修並重。

(3)高等師範時代曾有理化部及史地部之設置，并無主副科之分，畢業生服務成績，均甚優良。今日之系即當時之部，當時合宜，今日有何不可？

(二)主張設副科者

(1)各師範學院教育系人數之多，當另有原因，非出路較廣所致。蓋以國文、數學、英文等系之學生，均較教育系學生出路為廣而人數並不如是之多也。且因其人數之多，更應為設副科，以便在中學服務。至謂「結果會招致過去教育學院造就教育方法特長而非專門學科教員的危機」，更屬過慮。試查中等學校授課情形，專教副科之教

員，當爲數極少。本院研究所調查西北中等學校教師服務狀況，統計結果，教其所主修者，佔全數百分之七五。二，教非所主修者，僅佔全數百分之二四·八，由此可見一斑。

（2）僅有三班之中等學校未能專聘一歷史、地理、物理、化學教員，固屬事實。然此小規模之中等學校，爲初中、高中或師範亦不可不注意；如爲初中，固無不可，若係高中或師範，則不無問題。蓋以在兼顧並重情形下之史地系或理化系畢業生，對於高中或師範功課之擔任，實不無困難也。倘使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四科各自成系，互爲主副科，則不僅聘教員之困難可以解決，而教學效率上亦可提高，兩制之孰得孰失，不辯自明。

（3）高師制之理化部及史地部與師院制之理化系及史地系不同，蓋以高師畢業生所教之中學爲四年，師院畢業生所教者爲六年。學生程度既異，師資訓練，亦當有別也。

綜觀兩方主張，吾人贊成後者。

今後中學教育改革管見

林 本

一 引言

國際教育考察團論中國中等教育之改進，劈頭即謂：「中國國家教育之弱點，即在中等學校，中國教育界莫不承認之；顧全部教育系统，實以中等學校為樞紐。」（國際教育考察團中國之教育改革）此雖十餘年前之評斷，大體仍可適用於今日。抗戰軍興，各方對於過去及現行教育之利弊得失，感之更切。教育當局懲前毖後，亦頗知所以改進之道。然以中學問題複雜殊甚，加之戰時種種特殊情形，故就現狀而論，若有費力多而收效不著之感者，此豈人謀未臧之故歟？茲者戰事早經結束，今後即將有幾許改革，以期配合建國需要。爰不揣淺陋，略陳私見，以與時賢商榷之。

二 關於中學學制者——建議恢復大學預科

中國之新舊教育，乃性質與形式截然不同之兩事，是以歷次學制之建立與改革，即乏歷史根據。其動機由於外鑠，其訂立方法為撫拾他國之榜樣，而稍稍加以變動，其變動之處亦無足輕重，故一般認為純然出自模仿，非無故也。民國二十年以後，教育界始稍稍感悟前非，而漸知返求諸己，依過去本身之經驗，作將來改進之張本，不專騖形式，轉覺調整內容更為重要。十餘年來，數度改訂各級學校課程，以期適合實際之需求。其間雖在中等階段，亦曾有中、師、職之分校及六年制中學之建立，要皆在原有學制之範圍內，以為安排，迄今尚未敢有根本改變，即以此耳。而此種持之有恆，慎重將事之態度，實為我們教育行政上之一種重大進步也。敬本斯義而又鑒於中學現狀之亟待調整，在維持現行學制之原則下，特申述一種行政補救辦法，以作準對時弊之針砭。其事維何？即建議仿民初舊例，由大學附設預科以代六年制中學是也。

從課程編制著眼，根據法令，吾人現有兩種不同類型的中學：第一為普通三三制中學，高初中分段設置，就業與升學並重，此為中國現下之正統派型式，其制仿自美國。其次，為六年一貫制中學，其特點在避免學科教材之兩重圓周，冀所以提高程度，專作升學之準備，亦為一種補救辦法，其制仿自歐洲。第三則為設置地方自治科目之縣立初級中學，其目的在乎養成地方幹部人才，俾領導社會，積極推進農村建設，此制有類於歐洲之中間學校，似由廣西國民中學脫胎而來。凡此三者，論功能似各有所偏重，而確為吾人之所必具，以適應社會與青年之所希求也。

第一種中學經多次之改正，窳其內容，已與翔制時迥乎不同，在目前似尚有存在之價值。第三種中學試行未及兩年，其成效如何，未可遽加評斷。唯第二種六年制中學，在五年以前（民二十九年十月公布），根據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之建議而設立，積數年之經驗，結果似不甚良好。所以然者，一則以教材未能即時完成，以應教學之需求。二則以六年一貫，年限實嫌過長，迢迢前途，確非家長及青年之意志特別定者，不易貫徹始終。三則以與同等學校之橫的溝通不夠靈活，又未能配合我國目前社會經濟之條件。四則以我國中學教育常受因襲觀念之支配，而實具惰性，對於此種新的嘗試，自始即無實行之誠意。最後亦即最重要之原因，則以制度雖變，師資依然未能改進，所謂換湯不換藥，故其提高中學程度之預期成效，難有把握。綜此數因，一般教育者對於六年制中學，大都已抱失望之態度，非無故也。而為之補救之計者，據鄙見，以為莫如恢復前之所謂大學預科，以代六年制中學，而專作升學預備之所。至少亦應由國立大學試設預科，與六年制中學平行實驗，以覘成效，其理請得而言之：

第一：六年制中學之設，其意在乎專一目標，以提高學生之程度，但欲求學生程度之提高，必先改進師資之品質。大學預科之教師得由大學教授兼任，其專任者亦與大學教授同其稱號，其待遇與大學教授相埒。如此，待遇改善，名位較高，不患人選不良也，此其一。

第二：國立大學多已粗具規模，各種設備自非普通中學所能望其項背。預科之設，不特與大學本部有無相通之便，且得假大學之力量，計劃設施，以增進教學之效率也，此其二。

第三：我們現採分省設置國立大學政策，而國立大學附屬中學在目前計有十二所（三十一年度）以之移入大學範

圍，而作準備升學之大學預科，不但輕而易舉，且爲最正當而合理的途徑，此其三。

第四：由大學自設預科，而預科專爲升入大學之準備而設，則彼此之連絡銜接，自非其他學校可比，此其四。

第五：大學預科收容普通初中畢業生，而大學除容納預科之優等生外，並得由考試方法，開放於一般高中畢業生，因其分段與全部修業年限並無改動，故大學及大學預科之與其他學校之銜接溝通，較爲靈活，不至如六年制中學之自爲藩籬，亦不至如六年制中學之有構成兩軌制之危險也，此其五。

第六：有人以爲大學設置預科，專作升學之預備，因大學爲數無多，未免礙及高中教育之發展。此語一見成理，細思之似是而非。蓋升學預備之教育，著意在乎人才之陶鑄，在精而不在多，其性質本與普通中學略有不同。而在三三制之原則下，大學預科之所設施又與普通高中可無大異，大學入學考試亦並未杜絕普通高中畢業生上進之路也。而所以必須有此一機構之建立者，意在提高中學程度，以增進大學教育之效率，且間接予一般中學以一種示範性的標準而已，此其六。

綜上六端，可見大學設置預科之充分理由。吾故曰：在現狀下之中國，估量經濟人才，吾人如不欲提高大學預備之程度則已，否則，實事求是，祛除虛糜，以期實效，除大學設置預科，以代六年制中學之功能，其道末由。

三 關於中學課程者——建議網羅中小學教師及各科專家商改課程標準

(一)中學之分組——初中教育以自己完成爲第一義，但爲兼顧就業與升學之需要，分成甲乙組，以資調劑，深爲合理。爲養成地方社會之基幹人才起見，縣立初中又別立一組以修習地方自治科目，亦屬必要。普通高中之目標，至少在現階段之中國，必須以自己完成與升學準備並重，故自第二學年起，別爲偏重文實之甲乙兩組，以示分化，俾便專精，又爲顧全就業之方便，增設業務管理科目，似乎自成一組，以養成事務行政人員，亦十分妥適。惟專以升學準備爲唯一目的之六年制中學，反採全般共同必修方式，而絕無分組分化之適應，此則不知何故？豈以大學應有更廣博之基礎，方能從多方面之融會貫通，盡其高深之研究乎？但事實上縱觀東西各國與我國中學變遷之沿革，

舉凡一切準備升入大學之教育機構，或稱高等，或名中學，或為大學預科，雖其間組別之多寡，與名目之繁簡，互有不同，然均行分組，絕少例外，（法制中學自始即以學習今古文而分A、B二組，第三年起又別分A一組以專攻拉丁，至最後之第七年更大分為文哲與數學兩班。英之高等班（Advanced Course）即中學之最後兩年。大抵分為古典、今文及數理等組。德國中學則自第六年起，三年間分數理、語文兩組。美國高中普通科（Curriculum）雖不甚分組，但採活動課程，任學生自由選習，其結果亦各有所專精，與分組無異。我國壬寅學制之大學預科分政、藝兩科，癸卯學制分三類，壬子癸丑學制分三部，壬戌新學高中制分文、理兩科。唯民十八年及二十四年之高中暫行及正式課程不分組。二十五年修正高中課程後復分甲乙組，二十九年修正高中課程仍之。）何獨於六年制中學為不然，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矣。故今後之大學準備教育機構，無論其為三三制之高中，六年制中學或大學預科，其必須分組專精，實無疑義。且除已有之甲乙分組外，六年制中學或大學預科，尚應增設一組以為入大學研究國學者之準備。蓋以國學深邃，輕易未許窺其堂奧，若僅恃大學四年之講求，而缺乏中學之深厚基礎，則恐祇可略涉皮毛，難期其能登堂入室也。

（二）分組課目之加強——查我國現行高中課程，自第二學年起，分為甲乙兩組：甲組加習算學共八學時，物理化學各二學時，（以每學期每星期上課一小時為一學時）乙組加習國文八學時及外國語四學時，是則兩年間兩組相差不過十二學時，特粉飾點綴，無濟於事，且其分組科目亦嫌範圍過狹。試舉外國數例，以資比較：法國中學之以今古文分組者，除共同必修科外，六年間分組科目A、A1、B三組各為八十四學時，其最後一年即第七年之文哲與數理分班尚不在內。法國學制，除古文中學完全獨立設置外，普通中學自第六年起分組，三年間，數理組之數理時間（包括本組工作實習在內）於語言組者為四十二學時，反之，語言組之語言時間多於數理組者亦同。日本中學以升學與就業為分組之標準，自第三年或第四年起，增課科目與時數，兩組頗多加減伸縮之餘地。迨至高等學校，則分文理兩科，其分習及增減科目，三年間各有七十學時左右。綜是以觀，可知各國如何着重分組之科目時數，以期達到名實相符之一斑。其中以德國所定為最新，亦較為折衷，大可供吾人之借鏡也。

至於分組應自何時開始？行之過前，恐因早期分化，不但影響學生心身之發達，且使共同修鍊之期間與文化的教養均感不足。失之過後，則又乏從容的時間，以為分門深造之機會，從而大學之基礎乃愈益貧弱而不可靠。法自

始即以今古文爲別，是失之早，而最後一年乃分數理與文哲，則又嫌其太遲，惟英於高等班之分組，與德從第六年起實行分組，似乎比較合理。汪懋祖先生曾主張六年制中學之第五六年應分文理，吾人之意，則以爲此種中學或大學預科，因其升學目標已定，且經中學前三年之試探與診斷，已不難發見青年之個性，而抉擇其應趨之途徑，故不妨比普通中學提前一年。六年制中學自第四年起，大學預科則自第一年起即分三組學習，似較爲折衷而妥善也。

(三)外國語時間之增多——在今日之中國，科學基礎未經建立，學術研究多半不能獨立，各種學問之講求，勢非從閱讀外國文獻入手不可。而文哲等科以及社會科學，其文字之了解與記述，普通又比數理方面更爲艱難。職此之故，吾人主張中學除分組專精外，必須大量增加外國語文選修時數——其志願就業者可以改習有關職業及地方政治經濟之科目——並改善其教學方法，以爲調整。關於此一點，日本中學及高等學校之情形，最足資我參考，因其學習西文之條件，完全與吾人相同也。查日本中學之準備升學者，其修習外國語時數，中學爲四十八至六十學時，高等學校除第二外國語外，文科爲五十學時，連中學合計爲九八至一百十學時；理科爲四十學時，連中學合計爲八十八至一百學時。比之我國六年制中學之爲六十學時，已覺輕重判然。至於普通三三制中學，連初中選習時數在內，高中甲組五十學時，乙組亦不過五十四學時，則相差幾達一倍以上矣。(日本中學第一二年各爲五小時，第三年爲六小時，第四五年各爲四至七小時。新制七年高等學校之尋常科，除第二年爲七小時外，其餘三年各爲六小時。至高等學校或新制高等學校之高等科，除第二外國語在三年間各爲四小時，名爲自由選習，實則一體必修者外，第一外國語文科爲第一年九小時，第二年各爲八小時。理科則第一年八小時，第二年各爲六小時。若在高等學校轉換其第一外國語者，則三年間又須各增二三小時。)他如德法諸國之中學，其學習歐洲現代語之情況，固與吾人完全異趣，但觀其規定修習時期之長與時數之多(如法國中學之今文組，其現代外國語時間，連共同必修者在內，第一二年爲六小時，第三四年各爲七小時，第五六年各爲九小時半，至最後則以工具知能已經修鍊成熟，無論哲學班與數學班，均僅授二小時而已。德國新制之普通中學，就外國語中之英文而言，全程八年學年間，數教理組修習六十小時，語言組則修習七十二小時。其最後三年間，本組實習時間之可以運用於語言研習者，尙不在內。)更足證吾人重視外國語文之合理焉。年來我國大學入學考試及統考之英文成績，水準大見低落(二十四年國立專科以上學校錄取新生之英文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占百分之五九·二二。二十七年統考，錄取川籍學生之

英文成績其平均爲二四·八八分，遠較他科目爲差。）頗有降格以就之感。甚至多數大學畢業生，亦仍不能自由利用一種外國語，以爲研究參考之工具，其情形之奇異而嚴重，確爲吾人所不容忽視者。改進之道，除必須積極大量增加外國語教學時數外，並應注意於傳統的教學方法之改善。扼要言之，即在平日特重外文書報閱讀之練習修養而已。

（四）數理教材之調整——數理常識之灌輸與科學態度之養成，以及科學方法之應用，固爲普通中學所必具之學養。但其超過某種限度之高深而繁複的數理知識，則僅爲準備專攻實科方面者之所單獨需求，實不必普霑於全體，此乃形式陶冶說（Theory of Formal Discipline）沒落以後，歐美教育界之通論。尤其在我國中學，更可切實糾正其流弊。因吾人對於課程，既無三學四科（Trivium and Quadrivium）等歷史的淵源，而社會上亦無牢不可破之傳統與偏見也。然而細按事實，似又不盡然，識者謂：「中國中學數理教本程度之高與其包容之豐富，勝過歐美多。」此一半由於年來舉國學術界提倡重理輕文之結果，而一半則寧可歸咎於內容之選擇不精，與呆板而不切實際之故。因之，莘莘學子多視數理爲畏途，而究其所學，則無論於學科之本身的及預備的價值（Initial and preliminary value），似又毫無足取。反之，對於性之所近，有志於斯學之深造者，轉以遷就他生之故，猶覺準備之不甚充分也。補救之道，莫如加強分組，而大異其學習程度，俾得各任其志，各安其學。有人以爲戰後中國躋於五強之一，必須儘速工業化，以期迎頭趕上。因此，中學課程更應增強數理教學，以建立作育工業人才之良好基礎。此言誠然，但所當增強之者，實仍爲中學生之一部分，而非全部，是則爲吾人所必須了解者。

（五）學科科目之統整——晚近美國中學發生兩種相反的傾向，一面在舊式傳統的中學（Conventional High Schools）爲着適應多方之需求，科目之分化日形繁複。而一面在新式實驗的中學（Experimental High Schools）則科目有兼併統整（Integration）之趨勢。如「自然科學」（General Science）「混合數學」（General Mathematics）以及囊括史地公民之「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等，據專家調查研究之結果，即就學科成績之本身而論，後一種辦法亦常比前一種辦法爲優也（參看 Wrigth stone: Appraisal of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Practices 1936）。我國當頒行壬戌新學制之初，對於初中自然，亦曾一度採用混合編制，卒以十年來之經驗，深感結果之不佳。故至

二十二年公布中學正式課程之時，以師資教材兩難之理由，毅然修正，而改採分科制。唯細考其所以改變之最大原因，實由於學生成績之不良。而所謂成績者，是否切合於初中生活教育之合理標準，則仍屬疑問耳。據鄙見以爲我國中學現將有數種不同的類型，而必須分別顯示其相異的機能。大概自大學預科，六年制中學，普通高初中，以至於縣立中學，其升學準備性漸弱，而自己完成性愈強。此完成性最強之縣中及普通初中，其課程教材完全應以生活爲本，而絕不受科學本身之箝制，固無論矣；即在普通之高中，雖其所學儘可略示學術之門徑，但決不能忘却社會實際生活之背景，其與大學之真正從事於科學研究者，大異其趣。由是以觀，可知一般之稱中學生成績不良者，恐未必真是中學生應有的成績之不良，而在學校與社會相離，學科與生活脫節之傳統的見地上，作此純學究的判斷耳。於此，吾人在初中實施生活教育之立場，鑒於輓近歐美著重生活單元（Life unit）的設計教育及合科教學（Co-sant-unterrecht）之趨勢，以及廣西國民中學試行新課程兼併而爲國文、公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勞作、地方建設、體育及藝術等九種科目之先例，却不能不主張初中教學科目之必須予以統整也。

（六）課程之兼顧理論與實際——各種學科之於各級學校，因其所負使命之不同，即用同一的名稱，亦當顯示其不同的內容，觀於上述高初中科目性質之攸異，思過半矣。然而一查我國中學之實狀，則不盡然。有人謂：「中國中學教科書之程度，遠勝於歐美，」信哉斯言。有人復謂：「在中國而言教本，則初中爲高中之縮影，而高中又爲大學之具體而微者。」誠如此，是語並足爲前一句之注腳也。職此之故，教材乃與生活脫節，其內容乃趨於抽象精深而繁重。且因其編制過分富於論理性，而缺乏心理的適應；既不能打動青年之心弦，以引發內在的興味，又不爲學子所能了解，而勝任愉快，於是不得不運用外鑠的力量，以鼓舞或強求其努力，最多做到囫圇吞棗的讀死書，以造就一個爲讀書而死之書癡而已。教育云乎哉？此種弊病，由來已漸，而考其所以然之理，不外下列之兩端，試分別言之：

（一）我國中學課程標準之擬訂，與中學教科書之編纂，常出自少數專家之手，並未廣徵各方實際教育者之意見。而各校教師對於試行之制度法及課本等，雖有異議，或別具見解，亦每多因循遷就，而未有彙案建議之習

慣。以致上下隔絕，理論與實際無法溝通；於是所謂專家者流，既不能窺測人的生活之全豹，又不知兼顧各級教育之銜接，各囿於所見，各重其所學，對於手訂之標準與教本，乃競趨於抽象、偏頗、枯深、繁重之一途，而跡近閉戶以造車矣。

(2) 與各級學校相銜接，原為中學教育之一個核心問題，而銜接尤以教科內容之連絡為首要。查我國各級學校之教材，大都以採螺旋制或圓周制為原則。高初級小學各成一環，初中自為一圈，高中又來一圈。幾經循環反復，如不細加玩索，以求所以銜接之道，則重床疊架，虛糜寶貴光陰，損失何等重大！即據章頤年氏研究師範課程所列教育科目內容之結果，就五種同在商務出版之代表的教本而言，其彼此重複的現象，已呈五分之一以至二分之一之比例。（見章著：師範學校之矛盾形態，教育雜誌二十七卷第七號）則在普通中學，尤其是上下級學校間之教材重複，其情形之嚴重，更不難想見矣。綜上兩端，而思所以糾正之道，莫如今後一方面網羅中小學之優良教師，本其實際經驗，以與各專家協力共同商訂中學課程綱要；而一方面對於中學教科書之審定，除由國立編譯館之嚴密核定後，復經一定試用之階段，發往若干指定中學，實際試用，然後依據其報告，再事修正。如此不特更能切合實際之需要，且亦較能注意其與各級學校間教材之連絡也。

四 關於中學行政者——建議維持公費培植制度

中學公費補助制度之建立，實為輓近世界教育界之共通的願望，因其輔掖清寒優秀學生，以輕減其升學困難，從而得防止或解除階級性的雙軌學制之束縛也。目下美國之公立中學與大學均一律免收學費，英國之中學教育普及運動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 由來已久，迄今免費學生之在受有國家補助費之中學者，其數已達此種中學全體學生之半（一九三一年為全體學生的百分之四四·三）。他如德法等國亦莫不有類似的制度之存在。我國自訓政期約法（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公布）仿德國韋瑪憲法之例（對於有志深造而無力升入中等及高等學校肄業者，國家及各邦以及公共團體，均應設法救濟之；而於優秀兒童尤須給與學資，俾得完成學業）明文規定「全國公私立學校應設置免費及獎學金額，以獎進品學俱優而無力升學之

學生。」（第五十六條全文）以來，前後兩次憲法草案（民二十三年十月立法院通過之憲草，民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國府公布之憲草）均有同性質之條文可按。事實上，各省政府亦頗能仰體約法本旨，於公私立學校，分別設置獎學金及助學金，實行有年。抗戰以還，教育部鑒於實際需要之迫切，更進一步而毅然支撥鉅款，在國立大學及中學新創貸金制，而後又改稱公費，俾多數學生同受國家之惠。此種大規模之公費培植人才辦法，亦即公費補助制度之最新進而優良的辦法，如能澈底推行，則所謂教育機會之均等開放等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從而演成階級性的雙軌制之危險，得以防止或消弭於無形。吾人爲世界樹良好之先例，爲萬世建儲才之規範。行之經濟竭蹶之戰時，既屬可通，則施之於財力恢復之平時，決無難以爲繼之理。深望教育當局能本乎抗戰建國之真義，勇往邁進，以期早日實現吾中華民族之「天下爲公」「有教無類」之偉大教育理想。

五 關於中學師資之培養者——建議高初中師資之分別訓練

中學程度之低落，已成爲現下教育上最嚴重問題之一。六年一貫制中學之試設，恢復大學預科之建議，與夫大學之所以補授基本學科者，率由於此。而所以然者，中學師資之不良，實爲一大原因。查現制師範學院在校肄業四年，出校實習一年，實際即爲修學四年畢業；然以採史地、理化、博物等複系制，又須兼習專業科目，其專門程度難期高深，不言而喻。今以彼等出而擔任高中講席，仍嫌專門之學養不足，恐無以副一般「提高中學水準」之望。若令專任初中教職，則有所不願，勉強行之，不特將來志願入學者人數大減，即已經入學者亦將以師院爲傳舍，至功德圓滿之時，望望然去之，分道揚鑣，以各赴其新途徑，其不爲功令所限也無疑。故爲提高師資程度，而又顧及修業年期之短長，俾各得其所，各安其業起見，莫若分別高初中，培植師資。

高中師資可由師範研究所負責，或將師院第二部延長一年，改稱高等班，招收文理學院畢業之成績優異者，一面作專科之補充與深造，一面受專業之訓練，兩年畢業，授予碩士學位，寧少毋濫，以當高中教席之選，而由政府確實與以就業之保障。因高中富於選擇性，質重於量，故對於師資之需求，亦不在多而在精也。

至於初中，則實施較高等之普通教育，以養成社會上中下級幹部人材爲目的，量重於質，其必須重視機會之普遍開放，固不待言。惟學校數量既多，師資需要亦亟，又以經濟待遇等種種限制，故對於師資之質的條件，不能期望過奢。雖在戰前之調查，中學教師之具有大學畢業程度者，約已占半數（鄭四谷氏受中國教育學會之託，於民國二十四年，調查全國中學教師實況：共計九十八校，教師四、〇九五，跨十二省、三市，加入資格統計之教師凡三、一八八人，其中大學畢業者占百分之四〇·二八，專門學校畢業者占百分之一四·一一，高師或師專科畢業者占百分之一二·九九，師大或教院畢業者占百分之一·三五，留學而有學位者占百分之五·〇二）。但此爲非正常的現象，不足爲訓。（因當時其他院系畢業生無正當出路，以致相率在中學任教。）觀於已受專業訓練者之少，（上列高師師專與師大教院畢業者，合計不過占百分之二四·三四。）以及教非所學，任課不專之情形，思過半矣。所以就現狀言，以師院專修科或獨立設置之師範專科學校之程度，招收高中畢業生，分文公（國文公民）文史（國文歷史）史地、數理、理化、博物等複系，予以二年間之訓練。或招初中畢業生，予以五年間之訓練，最爲適宜。且就全體之受教歷程觀之，十二年普通教育之上，再加二年專業訓練，先後十四年，比之於東西各國之中學低年級師資訓練年限亦屬相當。（法日約爲十五年，英爲十五年至十七年，美國爲十四年至十七年。）唯近在歐美試行中小學教師同等訓練與單一俸給制之趨勢中，而有此高初中分別待遇與分別訓練之主張，非敢故意立異，實有鑒於我國社會之實情，而作此不知輕重之建議耳。

本文對於中學教育作綜合性的檢討，故參考或摘錄左列舊作之處甚多，特此聲明。

- (1) 對於六年一貫制中學之我見（教育雜誌二十九卷八號）
- (2) 論六年制中學（教育通訊四卷四十五期）
- (3) 如何調整現行中學課程（教育通訊五卷二十二期）
- (4) 今後中學教育改進之途徑（中等教育季刊一卷三期）
- (5) 改進師範學院之幾點意見（教育通訊四卷三十八、九期）

論今後我國中等教育的改造

金澍榮

回顧我國中等教育數十年來的歷史，改變不可謂不頻繁。除了隨着政體的變更或教育精神的轉變而發生的幾次規模較大的改革外，還有過不少較為零碎的、局部的變動。可是這許多次的變遷，並沒有使我國中等教育的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戰後我國中等教育需要徹底的改造，並且這種改造必須有一個周密的通盤計劃作根據，在今日幾已為教育界輿論所公認。但在談到具體的計劃之前，我們似應先尋求歷次改革的缺點，藉作今後改造的參攷。本文之旨，即在於就筆者觀感所及，針對過去改革的缺陷，提出今後計劃中等教育的改造時所應有的幾個注意點。

筆者認為過去歷次改革所常犯的幾個大錯誤是：(1)不能參攷歷史的教訓；(2)不能善用外國的經驗；(3)過重輪廓的形式的改變，而忽視內容的精神的改造；(4)忽略教育問題的連環性。今後擬定中等教育的改造計劃時，對於這四種缺點，必須力加矯正。茲分別加以說明如次。

一、參攷歷史的教訓 在數十年來我國中等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以前失敗過的辦法，往往在相似的條件下照樣採用，結果只有再蹈過去的覆轍。近年在普通中學內設置簡易職業科目的辦法，便是一個顯著的實例。我國中學課程固應適應學生的個性，我國的學制內固應有一個類似中間教育的部門，但在普通中學內置設幾種職業學科，已經歷史證明並不能有效的滿足這兩種需要。民國六年教育當局鑒於中學課程的呆板和中學畢業生無適當出路，曾令中學設立所謂「第二部」來收容將來志願就業的青年。辦法是從第三學年起，酌減普通學科的教學時數，增設農業、工業或商業科目。結果只在學制上增加了二個新名稱，對實際毫無補益。第一，以一個普通中學的基礎，來設置幾門職業科目，教師的延聘和設備都首先成問題。第二，在多數青年進入普通中學時便懷着升學的希望的狀態下，中學縱然設置職業科目，選習的人也不會很踴躍。第三，在國內尚無大量新式中級生產和管理幹部的需求，而學校又

不易與僅有的少數新式生產事業取得聯繫的情況下，縱然有人選習，也不易解決青年出路的問題。這是民六二部制失敗的主因。現行普通中學設置職業科目的辦法，與民六的二部制可謂如出一轍。現時除了社會對於各種中級幹部的需求較前增加外，其餘使二部制失敗的條件不但繼續存在，並且隨高等教育的發達和公費額的設置，青年升學的機會比以前更多。結果是初高中的職業選科，和民六的二部制一樣徒有其名。

他如普通中學、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之時而合設，時而分設；高中課程之時而分組，時而不分組等事實，皆足以表明過去經驗之不能善用，至使發展呈着循環的狀態。「嘗試與錯誤」式的發展本來不經濟，若連錯誤的教訓都不能利用，那就更要造成許多時間與精力上的虛費了。

今後計劃中等教育的改造，最好先將過去一切設施的得失，作一總檢討。凡經試用而失敗的辦法，假如致敗的條件仍然存在，便不宜再用。

二、善用外國的經驗 現代各國中等教育的設施，足供我們參攷的固不在少，我們當然可以採人之長，補己之短。但外國經驗貴能善於運用；過去只知作片斷的、無條件的抄襲的毛病，今後必需戒除。參攷外國經驗時，最好能顧及下述兩個條件：

第一，每一個國家的每一種設施，都有它發揮效用的環境條件；環境條件相同，然後才能發生同樣的效用。例如中學畢業會攷的制度，顯係參攷法國而來。法國中學教育的傳統目標着重心智的鍛鍊，他們認為這種鍛鍊的具體結果是組織思想和用語文來表達思想的能力。這種特質，當然可以藉幾門科目的攷試觀察出來；因此中學畢業會攷的辦法，在法國可以達成攷核中學教育成績的任務。我國中學教育的目標包括全面生活，現行法規中所指定的「公民道德」「勞動習慣」等成份，決不是幾種科目的試驗所能攷察到的。若假定中學畢業會攷的辦法在我國可以和在法國一樣表現出中學教育的全部成績，豈非大謬？

第二，各國中等教育的趨勢，往往比各國中等教育的現狀更值得供我們的參攷。西洋中等教育的制度和內容，大部份係歷史傳統的遺物，有時彼邦人士明知其與理論的趨勢和現實的要求都不相符，但礙於傳統的束縛或其他阻

力，雖欲澈底改正而不可能。這種情形，在歐洲尤為顯著。例如戰前法德兩國的「單一學校」運動（Eco. e.H. C. unique; Einheitschule）以及英國去秋方告成功的中等教育改組運動，往往比原來的狀況更能代表應有的情形。我國人士每好徵引西洋教育的現狀，而忽略其趨勢，筆者以為若要借重外國的經驗，參攷趨勢似乎比參攷現狀更為重要。

三、內容精神的改造與輪廓形式的改變應兼顧並重 歷次改革的另一缺點，就是偏重於用功令來推行制度的形式上的改變，而對於內容的運用是否符合改革的原旨，反少過問。其實，制度本身不過是一個軀殼。軀殼的完備固大有助於教育功能的發揮和教育目標的達成，但僅有完善的軀殼決不足以保證教育的成功。確立一種最切合我國需要的學制，固為我國今後教育的改造上一個重要的問題，但對於內容與立國理想和各方面建設的需要的配合，更應多加注意，勿再徒事於形式上的改變。

四、顧及教育問題的連環性 一種教育的事實，和教育的範圍內外的其他事實，總是息息相關，因此每一個教育問題，和其他問題常帶着一種有機性的連繫。任何一個問題，都不易被當作一種孤立的現象來單獨解決；勢非連同它所牽涉到的其他問題，作通盤的解決不可。事前缺乏通盤的計劃，對於所牽涉到的各種條件和問題又未能充分顧及，可以說是過去改革的又一通病。例如民國十一年學制和課程，從理論上說何嘗不算進步。可是當時我國的師資、物力，以及整個社會背景，都沒有實現這種制度和課程的優點所必具的條件。結果不但改革的原意不能實現，反而在中等教育方面造成一種參差龐雜的現象。

至於較為零碎的局部的改革，更每因忽略各個教育問題間的有機的關聯，而產生許多矛盾和失調的事實。例如既將「養成勞動習慣」和「啓發藝術興趣」列為中學七大目標中的兩大項，而民國二十一年頒佈「第二課程表」（為需要邊疆語或第二外國語地區用的課程表），以及民國二十五年修正中學課程時，又任意將時數本來不多的勞作、圖畫、音樂三科的鐘點裁減。又如民二十一至民二十五間為提高學生的程度起見，已經將高中每週上課和在校自習的時數增至六十小時，同時為注重青年體格的鍛鍊計，又令中學生每日至少從事若干小時的課外運動，在學生每日連上課

帶自習共需用十小時的狀態下，試問這課外運動的時間從何而來？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了各個孤立的改進辦法間的矛盾。有了這些矛盾的存在，負責執行的人當然除了敷衍之外，更無他法了。

今後改造的計劃，必須充分顧及每一實施項目和其他項目的關連，以及每一項目在實施上所牽涉到的一切條件和問題，務使計劃中的每一項目，和中等教育範圍內外的一切事實，都能獲得調協。

本文僅提出談中等教育的改造計劃應該首先注意的一個原則，未及建議改造計劃所應有的內容。就現時的情形論，我國的中等教育從目標、課程、制度，以至於教導等方面，都含有若干急待解決的問題，異日當再分別論之。再者，上述各種缺陷的表現，初不限於中等教育的範圍，但在中等教育的階段內，這種情形特別顯著，故本編專從中等教育立論。

普及民衆基本教育問題

李季開

一

在現代文明的社會裏，必須使一切的人都能充分享受均等的教育機會。因此不僅未成年的學齡兒童的教育，成爲刻不容緩的事，對於一般超越學齡時期的失學民衆，更有普遍教育的必要。現社會的命運，是大部分掌握在一般成人的手裏；民主國家的基礎，也是建築在一般民衆的身上。民衆基本教育的普遍實施，文化水準的普遍提高，不僅能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同時能敦促社會的進步，使國家步入富強康樂自由民主的境地，而保障着國際間的安全與和平。

但是，事實昭示我們在今日的世界上，仍有半數以上的成年人民，未曾受過必需的基本教育，他們安於愚昧與貧窮，困於飢餓與疾病，沒有讀寫的能力，不能解決自己的生活，無法利用其所居地區內的一切，有着豐富的天然寶藏而不知開發，於是不斷的引誘着帝國主義者的覬覦剝削，對於世界的和平，成爲嚴重的威脅。

在這全世界半數以上的未曾受過基本教育的人民中，我國的失學民衆將佔怎樣的一個數字？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未受基本教育的民衆還是停留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比例，一般民衆安於愚昧，困於生計，意態消極，深於迷信，求生之不暇，實感覺不到接受教育的需要；即使感覺到教育的需要，事實上亦沒有如許的教育機關可以容納；同時，一般推行民衆基本教育的機關，應用的教材之是否切於實用，方法之是否經濟而有實效，則又大有疑問。因此與學五十年來對於民衆基本教育的實施，成效極微，既談不到量的普及，更遑論質的改進？

二

我國五十年來雖於民衆基本教育的實施未能獲得如期的普及的成果，但是不能認爲即是未曾經過一番的努力。自從清末以來，朝野自始即曾感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所以清末廢科舉興學校，同時試行強迫教學，舉辦簡易識字學塾。及至五四以後，平民教育運動的掀起，亦曾蓬勃一時。而國民政府北伐成功，鑒於國民革命之喚起民衆的必需要，曾設立了許多民衆學校和民衆教育館，一度掀起了民衆教育的高潮。九一八到來，民族自救運動配合了民衆教育，短期義務教育和成人補習教育的推行又得到了廣泛的展開。但是，一些零碎的努力，似乎並未獲得完滿的效果，蘆溝橋的炮聲，竟把已往國家教育的缺點給整個暴露了。

全面抗戰的興起，卻產生了配合新縣制的國民教育，這原是一個具有革命性的有計劃的進步設施。它的特點，在同樣重視學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和成人補習教育。但是目前國民學校的改制，並未實現了這個理想，只是僅僅更換了一個名義，它的實質，仍似過去的小學；成人補習教育的工作，併入國民學校，卻反無聲無息，形同具文，等於被消滅了。第一次國民教育五年實施計劃的完成，只增加了幾個統計數字，對於民衆基本教育，究竟有些什麼收穫呢？

檢討過去普及民衆基本教育設施失敗的癥結，有人以爲由於國家財富的貧乏，有人歸咎於一般民衆不認識識字讀書的重要，又有人以爲由於推行人員的缺乏，甚至又有人歸罪於漢字學習的困難。但是筆者的認識，以爲問題並不如此的簡單。如果對於過去失敗的癥結，加以推究，則其根本的原因，可以歸納於過去推行方法的錯誤，推行條件的不足，以及朝野決心不夠的三端。

過去的方法何以錯誤？舉其重要的：我們首先要指出普及民衆基本教育的方法，歷來是走着狹義的僅是教不識字的人民識字、讀書的路子。把文字認作「萬能鑰」，以爲只要人民能認得幾個字，讀了幾本書，民衆基本教育就算普及，民智就能開通，自個人以至於國家社會的一切問題，即可有解決辦法，這實在是一種過分樂觀的膚淺的夢想。殊不知事實上一般民衆大多是混混噩噩，度着近於原始的生活方式，昧於政治經濟的常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僅能爲解決自己最低要求的衣食而勞動，根本感不到識字讀書，甚至受教育的需要；即有時感覺到讀書、識字

的需要者，亦以困於飢餓線上，求生不遑，終日碌碌奔走衣食，猶慮不周，實在也擠不出一些時間來進學校去讀書識字。更何況書本與現實的分離，識字教育與生活的脫節，讀書識字變成了人民生活的裝飾和點綴，增加了消費，無補於生產。一般勞動者的子女，讀了幾年書，居然穿上了皮鞋西裝，敷上了脂粉口紅，搖身一變，反成了道地的新式消費者，原來的一點生產的勞動的身手，卻完全退化了，這給許多勞動民衆將是如何的刺激的寫照。無怪乎許多民衆學校和國民學校的民教部，竭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到今天招生留生還是一樣的困難萬分。這種慘敗的情形，實在是給從事民教工作者的一個嚴重的教訓。今後如再循此舊路延續下去，則恐怕再加上三十年五十年，也強迫不了失學的民衆都能認到字、讀到書，整個的民衆基本教育將永遠僵化停留於失敗的邊緣。其次，我們該指出的，即是過去伴隨着此種偏重識字讀書的誤解，於是無形間必致流於偏重學校教課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社會式的施教方法。本來這兩種方式是互相爲用，互相輔助的。但是社會式的各種方法尚多在嘗試草創的過程，而學校教課方式已有成軌可循，推行民教的同志爲了工作的便利計，自然易於不知不覺中偏重應用學校教課的方式。於是自清末以至全面抗戰的前夕，民衆教育的各種措施種類雖多，而簡易識字學塾、平民學校、民衆學校等各學校教課式的措施成分常感特多。等到伴隨新縣制的國民教育改制以後，普及民衆基本教育的工作，大部併入國民學校中的民教班，於是變成十足學校教課的方式了。此種學校教課的方式原是一種處理教育工作的選擇的淨化的方法，增進教學效率的必要措施，但是這種方式過於特殊化了，而又易流於保守，不能與現實生活密切聯繫，而與人事界完全隔絕。結果使成年民衆所學到的，不僅不能促進對於實際生活的適應，甚至會增加適應歷程的困難。目前此種學校教課方式的缺點，早爲一般教育界人士所指摘，暴露，民衆基本教育的設施如完全仰仗此種方式，將重蹈其覆轍。再其次我們同時應指出的，即是過去失學民衆受教的時間太短，以後又多缺乏繼續教育或學習的機會，兼之又處於不進步的生活環境中，於是既沒有應用所已學習的事物的能力，又沒有應用的機會，而學習基礎的薄弱且使其容易隨學隨忘，結果等於一無所得。依照普通的情形，過去的民衆學校或目前的國民學校民教部，都是規定着以四個月至半年爲一期，甚至有少到兩個月的。入學民衆每日上課的時間，又僅有業餘或晚間的一兩小時，學習的時間，實在

太少。四年的義務教育期間尙嫌太短，這四個月的教學時間，又何能奢望其能收到若何成效？兼之民教經費的貧乏，可憐，辦了初級班，即難設立高級班，失學民衆進了初級班，結業以後，多已無繼續教育的機會，而一般民衆爲了生活的煎迫，同時由於學校教課的不切實用，單調無味，早已沒有繼續受教育的興趣和勇氣，連原來的一點薄弱的學習基礎，亦將難於保持。

推行的條件，何以不足？舉其大者，可專就經費與師資兩項討論：我國五十年來民衆基本教育所以未能完全普及，有人以爲乃是由於物質條件的不足，有以致之。事實雖非盡然，而歷年教育經費的貧乏，殊不容有所諱言。教育本不是顯而易見可以急功圖利的事。無怪乎北洋軍閥當政時代，即使軍費已高出教費數十倍，而此可憐的教費，結果仍不免被挪移作了軍費。自從國府奠都南京以後，公立學校也常會因爲經費發不出而拖欠薪金。國家新訂的憲法，雖然明載着教育科學文化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但是近幾年來中央教育文化經費雖已較北洋軍閥時代大增，卻常是僅佔國家總預算百分之三有奇；而大中學校學生膳食貸金或公費暨黨團訓練宣傳事業等費，卻佔去不少。至地方教育經費其比例亦均不過百分之七八，與憲法中所載的理想比例距離頗遠。而此全部教育經費中其用於民衆教育者，所佔比例則更不知要少到幾許了。過去常有一種偏見，以爲中央應以主力辦理高等教育，省市辦理中等教育，縣以下辦國民教育或初等教育，於是在地方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國民學校或小學多不免因陋就簡，加之物價的激蕩，原有小學的班級還難維持，當然沒有餘力來辦民衆學校或民教部了。至於師資方面那更是可憐！目前以訓練民衆教育或社會教育師資爲目標而設的學校，可說是絕無僅有。以筆者所知，僅有蘇州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而無錫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亦可說是以訓練民教人才爲主的學校，惟均屬高等教育機關。國內真正以訓練民教師資爲主的學校實未之見。普通的師範學校，其訓練的目標完全是重在小學的師資，而未注意到民教師資的訓練。民衆學校或民教班的對象，完全是十五足歲至四十五足歲的男女失學成人，其一切興趣、志願、性情、習慣、經驗、背景等等，與小學部的十二歲以內的兒童完全不同，需要的師資自亦有異。筆者曾經參觀過多次的民衆學校上課情形，所見一般教師的教

材、教法、態度、口吻等，完全與對付小學兒童的無異。把成人亦當着兒童來教，無怪一般成人畏縮縮，羞人答答，認讀書爲恥辱，而不想入學了。同時一般的人常有一種偏見，認爲辦理民衆學校或民教班，乃是一種業餘的工作。即能幸而不看作是一種施惠的救濟事業，也會把它看成一種輕而易舉或是行有餘力的兼辦的次要事情。所以許多地方教育行政當局，常須責令其所屬各國民學校須就原有人員及經費兼辦民教部，既不責令另聘適當師資，又不增發經費。其有准予添設一人或稍發若干補助費者，亦是杯水車薪，毫無用處。此種辦法，即不是存心刻薄措油，也是誤解小學教師爲萬能機器，無非使地方教育當局用以杜塞責任，虛應故事而已。求有成效，將不可能。

朝野的決心何以不够？有人說我國自清末開始感到文盲問題，以至今日，幾次掀起的掃盲運動的高潮，實在大都是由於外鑠的，全是受到帝國主義者威脅的刺激，雖也可以引起多少的自省，但是自己缺乏深刻的認識和澈底的覺醒，肯傾全力以赴，則終無解決的一天。清末政府之所以辦理識字教育，實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屈服，感於革命勢力的日長，深慮統治局面的顛覆，不得已而出此，本沒有什麼誠意。五四運動時代，北洋軍閥忙於內訌，自然顧不到教育民衆的事，單靠一般青年學生因外侮而激起的覺悟與熱情來辦平民教育，運動雖然展開，卻難爲繼。國民政府北伐以來，雖然由於中山先生完成國民革命必須喚起民衆的昭示，而認識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的重要。卻因爲戰亂頻仍、國家多難，兼之種種條件的不够，政府與民衆無一致的認識，因此民衆基本教育終未得順利普及。而中央及地方教育當局，舉棋不定，見異思遷，推行辦法朝令夕改，終至用力多而成效微，實亦爲一重要的原因。

三

我國推行民衆基本教育的失敗，已屬無可諱言。今後要想順利的完成普及工作，自然須確定正確的方向，充實推行的條件，而最重要的還是在朝野上下能有一致的普及決心，堅毅不拔，以底於成。在這必須力求成效的今日，筆者願略貢一些改進意見，以備推行之參攷：

一、釐訂質量並舉的整個計劃——我國推行民衆基本教育即自國府奠都南京以來，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機關，

也不知已經訂立了多少推行的計劃、辦法或方案，何以至今一個都未能完成使命？推究起來，實則多屬空泛而不切實，訂立之初，常是注意到一種外表的形式，只在量的方面憑演繹的粗略的估計，謀求擴充，不能注意到質的並舉。今後欲求有效，必須釐訂一種質量並舉的計劃。訂立的時候，必須根據事實的需要的歸納，不能專注意於在定期限內設立幾許學校班級，收容幾許學生，尤要注意到各階段的質的方面達到如何的標準。民衆基本教育，已不僅是訓練一些成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讀、寫、算的能力，同時需要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產知能，激發民族意識，甚至尚須明瞭世界大勢，增進國際了解。因此各階段的質的標準，必須力求擴大，不能再斤斤於讀寫算的狹隘範圍。

二、寬籌大量應用經費——寬籌民衆基本教育的經費，乃是促進普及民衆基本教育的先決條件。過去國內所用於民衆基本教育的經費的稀少，既是不能推動工作的一個主要因素，今後應不向空談，以增籌經費為第一要着。首先我們希望國內的戰亂能從速停止，國家的秩序能立刻完全恢復，憲法中所載明的教費支配原則，能得以實現，一律嚴格遵守，以法律來保障教費的獨立和穩定，如此則在教費方面可得大增。此所增之大量教育經費，以普及民衆基本教育的需要如是迫切，宜於一定的推行期內，專用於此。一俟普及得有成果，然後轉移經費用於發展中等及高等教育。能如此民衆基本教育之普及，當可指日而待。

三、微調及訓練推行人員——一般失學民衆其興趣能力需要嗜好以及經驗背景等等，較之普通兒童複雜多多，指導教師着實不易，必須有相當的訓練始可。我國目前稍有訓練之小學師資尚感不足，憑空要想訓練出一批能够得上理想的民教師資，實不知要從何說起？但是民衆基本教育不能等到師資訓練好了再求普及，所以目前理想的辦法該是一面推行，一面訓練，在推行中訓練，在訓練中推行。我們認為使全部失學民衆都能受到基本的教育，則全部所謂知識份子應該負起責任。從事各級教育工作的現職人員，如各級教育行政人員，大中小學教師以及一切教育文化界人士，自然是最易了解普及民衆基本教育方法的人。大學師範學院以及師範學校的學生，爲了正在接觸教育學術的研究，當然也易於了解一切適當的方法。這許多人，我們認為該完密的組織起來，負起推行民衆基本教育的

領導責任。其次，我們認爲目前一般大、中學校的學生，在兵役方面既是可以延緩服役，則自應對國家負起「教役」的義務。教育失學的民衆，該是緩役的人應盡的責任。這許多大、中學生倘能於完密的組織與指導之下，在一定的期限內參加推行民衆基本教育的工作，則必能發生偉大的影響，而使民衆基本教育得以迅速的普及。至其詳細的辦法，尙容另文討論。

四、改革推行的步驟和方法——前面已經充分指出已往應用於普及民衆基本教育的步驟和方法，完全是在狹義的讀寫算的教育方法上兜圈子，不能審慮民衆的環境和需要，結果自然趨於必敗。今後欲求普及成效，必須以新的姿態來替代原有的方法：

(1) 以民衆整個生活的改進爲出發點——民衆基本教育之所以重要，即在與一般民衆生活有密切關聯。如果教育的實施不能以民衆整個生活的改進爲出發點，不能使民衆藉此而適應生活、改進生活，則將毫無效果可言。英、美、蘇俄當日之所以能順利普及民教，即在其設施內容和方法能適應於產業革命或共產革命以後的生活上的變動的需要。墨西哥的教育者於此尤其深切的認識，他們肯定在推行開始，讀寫並不重要。只有運用教育的組織、方法和力量，以改進成年民衆的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使其因環境之改善亦即生活的進步，而感覺教育的需要，自然的認識識字讀書的重要。這種由生活進步而教育的方法，確是我們應採取的。我們認爲惟有這樣始能使民衆感到受教育的需要，也惟有這樣始能建立民衆對教育的信仰。

根據以上的原則，我們認爲教育的活動，應儘量自民衆保甲組織，辦理選舉，組織合作社，設立工廠，改良農業，推行新式農具，改進公共衛生等各方面入手，逐漸引進到識字讀書的指導，則民衆基本教育的普及，必能水到渠成。

(2) 學校式與社會式同流並進——爲了應付這樣以民衆生活爲出發點的教育設施，這是一個艱鉅偉大的工作。它的方法是不能僅限於學校教課的方式，因此原有的國民學校的民教部實是擔負不了的。我們以爲應於設立國民學校的地區，同時組織民衆教育館一類的綜合性的機構，打破學校的藩籬，教室的桎梏，而擴展範圍運用各種學校式

與社會式的教育方法。這個組織該是今後地方建設的先鋒隊，民衆生活改良的導師，民衆基本教育推行的中心樞紐。它一方面應與地方行政機關密切聯繫，以推進地方建設，改造民衆生活；一方面又須與國民學校一致行動，以完成教育工作，提高文化水準。

(3) 運用民衆本位的教育方法——對於許多兒童的教育，大家都知道提倡兒童中心或兒童本位的方法。相反的對於成年民衆的教育，如何能不採用民衆本位的方法呢？我們該認識受教的對象，是成人，是民衆，是農夫，是工人，是一般勞力的婦女，我們選擇的教材該是適於他們需要的興趣的，並且合於他們經驗的能力的。因此所用的教材必須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如國定的教本，用全國劃一的教材，實在不能完成普及民教的使命。至少也該分編許多種，俾得易於適應。至於教師教學的方法，應多從實際的活動開始，亦應刻刻注意以成年民衆爲中心，用成年民衆所喜歡的表情、動作，說合乎成年民衆興趣和經驗的話。支配教學的進度決不能太快，必要時寧願延長教學的期限，而不能使其囫圇吞棗，胡塗了事。

(4) 充分擴展繼續教育的機會——根據以上的從民衆生活的改進爲出發點的教育方法，則目前三四個月即告結束的教學即不能再爲適用。其實在如此短短的時間內，即能將各教材一一勉強學完，也決不會學得透徹穩固。所以我們認爲成年民衆的學習，一方面須與生活的改進密切聯繫，即學即用，即用即學。同時並須有繼續學習的機會，必須充分擴展繼續教育的設施。學習的活動，好比爬扶梯，一步之上還有一步，只須你有志願有興趣，繼續學習該是必須利便與鼓勵的。此種繼續教育的設施，學校式與社會式的方法，仍可同時並進。

(5) 嚴密輔導考核的工作——民衆基本教育的設施既該如此的擴展，輔導考核的工作自更屬重要。但是，輔導和考核的方法則與以前專在注意於讀書識字者將大異其趣。此種輔導考核的工作，也須於成年民衆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各方面的進步去着手。國民的道德是否具備？自治的能力已否養成？生產的知能有無增加？民族的意識曾否激起？國際的大勢是否了解？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是否孕育？這一切的一切將是輔導考核的具體項目。各地區各階段各成年民衆的需要是不會相同的，輔導考核的工作也需要靈活的運用。

民衆基本教育的普及，是目前我國建國過程中最偉大最艱鉅亦是最迫切的事。今後倘使朝野上下，共具決心，把握正確的方向，寬籌應用的經費，訓練合用的師資，運用靈活的方法，則普及的成果，必能在建國的過程中發生偉大的影響。

我國職業教育建設之途徑

石顯儒

職業教育最單純的目標，即是教育職業。職業的種類愈多，職業的轉變愈速，則所需要於職業教育者，亦愈急切。社會是由許多種類的職業所形成，職業的遞嬗轉變促成社會進步、文化增高、生活優裕；世界上職業最發達的國家即是最文明最富強的國家。我國四千餘年來人民囿於少數職業範圍內，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均業農，因而文化退步，國力衰弱，民生凋蔽。這是必然的道理。

大戰以後職業界將有一番巨大的變化，尤以我國為最甚，我們在今後要由守舊的農業國而變成前進的工業國，一切要機械化、摩托化，即是農業本身也要現代化，一切要利用科學，信賴科學，以機器代替手工，以電能代替馬力，以物理化學解決工程上之難題，所謂「精確」「迅速」所謂「標準化」「普通化」，所謂「組合工作」「大量生產」，這一切新的生產條件與經濟原則，打破了舊式的手藝傳統，更造成了職業界空前的大革命。

昔日之所謂製造，所謂「活路」，只是少數的匠人玩把戲、弄花樣；現代的工程要由幾千幾萬人分擔，一件成品是由許多廠家製造的許多零件所合成，為的是普遍供應、經濟時間。在昔日一個人要用半生精力學會一種技巧，這種技巧能保險他後半生的飯盃無問題，現在一種技能或一種職業有時在幾個星期內會被另一種新的發明或新的技術所排除推翻。

在舊的社會裏職業的轉移性很小，一個家庭的職業，由父而子，由子而孫，「世代祕傳」，永不會落到旁人手裏；仕之子為仕，農之子為農，工商之子為工商，職業教育是家人父子間私人的授受，不是社會事業，更談不到國家政策。

今日的世界，一切的一切在動，一切的一切在變；新的職業時時在增添，舊的職業時時在淘汰。一個人的職業受着社會潮流的支配；一種機器的發明，一種代用品的出現，甚至一種時髦風尚的流傳，都會影響到職業上的波動。數年前，美國婦女風行電燙理髮，朝鮮的一個髮簪製造工廠很快的就倒閉了，結果有幾萬工人失業。經過一次大戰之後，退伍的軍人半數以上不能恢復原來的職業而需另找出路。現今的時代真是光怪陸離，瞬息萬變，渺小的個人，怎樣能應付這萬變的潮流？古老的國家怎樣能立足於這個突飛的世界？

凡是用教育方法授人以職業技能，不論教者是初學或是準備轉業，都稱之為職業教育。這種職業教育在大戰之後的世界一定比在戰前重要百倍千倍，成為復員工作中的最大項目。但是傳統式的職業教育是不能應付這未來的大時代的，由於近代戰略戰術的教訓，我們覺得今後的職業教育要「開闢第二戰場」，要一些「降落傘部隊」，同時更應有一個澈底的口號，那便是「舊式的職業教育必須無條件投降」。

過去職業教育所發揮的性能大小，按照以往的作風慢慢的改善，負不起解決今後職業問題的艱鉅責任。

我國提倡職業教育，從清末之實業學堂起到抗戰前止，算是達到了職業教育最高記錄。根據統計的報告，民國二十五年我們共有職業學校四九四校，畢業學生一〇、二九四人，抗戰後，地區淪陷，職業教育更受摧殘。民國二十八年的統計，全國職業學校只有二八七校，畢業學生共五、六四四人。以這樣渺小的數字，怎能解決戰後千萬人的職業問題？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一書所昭示之鉅大數字，怎樣如期完成？

今後我們職業教育應加速的建設，並應選擇穩妥的路綫以新的姿態向前邁進。這在教育方針、建校計劃及教導方法上，須事前慎重的檢討，以求得一確實有效的答案。

二

職業教育以培植中級技術人才為目的，既非造就技術專家，又非實施一般的所謂人文教育，目標既顯著而又單純。過去之職業教育失之目標含混，職業教育不教職業，職業學校，太似普通學校，所有學制規定，課程編製，以

及教學方法等多半脫胎於中等學校的整套模型，而把職業學校束縛於呆板的典範之中，結果，學生畢業後，竟無一技之長，被迫的走上升學之路。

職業學校，目的在教育職業，與職業直接關係的普通課程應由普通中學負責教授。既是職業學校即不必兼辦中學教育，真正的技術訓練，若能集中學習，所用時間極為有限。以三年或六年的三三中學制來束縛着渴望就職的青年，不僅誤了受教者的本人，同時也佔據了他人學習技術的機會。職業學校應該集中精神辦理實習廠場及管理生產業務，不應該把中學校的一切任務照樣的加諸職業學校肩上。生產事業需要分工，教育事業何嘗不需要分頭負責？職業學校若是減去普通學校的負擔，則其教育職業的效率至少能增高三四倍。

戰後的職業學校要成千成萬的訓練技工，在設備上，應造成真正的職業環境，工作實習應是教學上最主要的工

作，並應與設科有關的職業界確實溝通聯絡，凡職業界所希望於技術工人的一切條件，應該澈底求其完成。但事實證明，職業界所要求於職工者與教育家所希望於學生者，不盡相同。前者的需要在「點」或「線」的技術，注意在深度；後者的希望則為「面」的訓練，注意在廣度。因受過多年教育的學生，在職業界視之還是「不大中用」，所以今後的職業教育必須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以期適應職業界不同的要求。全面的技術要培植，節省時間的短期訓練，也同樣重要。家境寬裕的學生不妨延長學習時間，從各種基本學科入手；迫於生計之青年即應於短期內授給一種技能，使其早有出路。今後的職業教育應當維護兩個並行不背的原則，一是注意職業的特質，就地取材，因時制宜；一是注意學生的處境，個別指導，因人施教。

三

今後的職業教育必須依照各部門之建設計劃實施，否則，人才的供應與事業的需要不配合，則必有過剩與不足之現象。今日大家已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那便是今後需要大批的建設技術人員。但是究竟那些部門需要多少人員？這個確實的答案是不很容易的，這是因為我們在今後的整個建設計劃尚未有具體的完成；在這一計劃完成後職業教

育大的方向便有着落。

今後的職業教育，應分期建設。第一期先就國家建設之首要設置學校，增添學額，以求量的發展；第二期一面適應新興的事業，擴充學校；一面更應充實教學的內容，加增行政管理，以求質的改善。所有師資之培養，教材之編著，教法之研究改良，都須於此時期着手進行。茲估定於今後五年時間完成此兩期預定之建設。

職業學校應以省市設立為原則，視地方之需要分區設置。凡工商業集中之城市或農場礦區均應以職業學校為指導之中心。職業學校要能配合職業，協助建設，應不斷的舉行社會調查、職業統計、研究職業動態，而預為之籌謀教育方策，所有各種學科之設立、各科學額之分配，各種課程之規定，均應以地方之客觀職業條件為準繩。

今後各部門所需之建設人才，數量鉅大，僅賴少數之省市立職業學校必不足以適應急切的需求，故必由各建設事業部門分別負責推行以求速效。所有農礦各場、鐵路電信各局，以及規模較大之製造工廠、醫院、商店，均應分別訓練與其本身業務有關之人才。所有省市以及上述各事業機關或人民團體設立之職業學校，如能達到規定標準，則中央即按其可能擔負之經費數額「一元對一元」的加倍補助之。教育部本身不辦國立學校（必要時為全國示範設立一二所），但以行政及經濟力量統轄全國所有之職業學校。權責劃分清楚，教育效果必然提高。

教育部為推行此制，必須加強視導制度，派專科視導員多人，分定區域，負責指導各該區域內之職業學校；如各校在教學行政上發生困難問題得隨時協助解決。

四

真正健全合理之職業教育，必與職業指導相輔而行。一種有系統的職業指導，為協助個人對於職業知所選擇、準備及就職業後的繼續上進。補助教師對於受業者之個性差別、職業興趣及其家庭、社會背景有深刻之認識，並使學校當局明瞭社會現況、職業趨勢，並進而調劑職業人才之供求。舊式的職業學校多忽視職業指導，在教學上偏重主觀見解，輕視客觀事實，教材少選擇，教法欠妥當，因而學生適應能力不夠，作業興趣減低；結果，事倍而功不

半，精神、物質、時間多歸虛擲，並演成教育與職業脫節，以及學校、家庭、社會各自為政的隔絕局面。

職業指導之實施，不限於職業學校範圍內，在高級小學之第三學期起即應注意啓發學生之職業興趣，介紹職業概況，講述職業常識，加強勞動作業，舉行定向測驗，並商談職業問題，引導其試選個性適合的職業，這在教育上統稱之為職業陶冶。我們的初高級中學生，職業知能極感貧乏，學校太偏重文理的講授，學生多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好高騖遠，以混得畢業文憑為第一要務。我們職業教育之失敗，中小學缺乏職業指導，實是原因之一。

職業學校的職業指导工作，更為繁重：職業導師除對學生不斷的舉行團體或個別談話，實施職業興趣、職業知能測驗外，並應訪問職業界，繼續指導已就業之學生，並調查職業狀況，工作內容，員工待遇，晉升機會等以為指導學生之材料。凡職業界所要求於學校或學校有求於職業界者亦由此導師負責傳達溝通之工作。

今後大企業組織必要實施科學的人事管理，人事都要負責選擇適宜的工作人員，以求生產效能之增進。近年來各國人事管理的趨勢，由消極的考核獎懲變為積極的指導調整；工作人員中如發現有興趣不合，或工作不協調，或在人事關係上有欠順應之處，即予以切實的指導，求人與事妥善的配合，達到「人盡其才，事盡其功」的境地。科學的人事管理即是部份的職業指導，此種工作即能發現教育本身的缺憾，而予學校當局以有益的建議，故今後之職業指導應由普通學校、職業學校及企業界共同分別實施，以求教育與職業之密切配合。

五

在大規模展開職業教育攻勢以前，一切準備工作至艱且鉅。在新的職業教育號令下，教育行政機構要加強，職教經費要擴充，大批的職業科師資與實習指導員要趕快培養；各種教學設備及實習工具機器等或由外訂購，或由國內自造，亦要設計籌備；各省市分區設校，就地設科的計劃更要早日擬就；經濟、交通、農林各部所需要中級技術人才之類別、數量應即提出，由教育部製定期訓練之步驟，由各省市及事業機關分別負擔訓練工作；我們在戰後需要的技術人才種類繁多，數量大鉅，必須以雷霆萬鈞之勢推動這偉大的工作。

今後職業師資訓練之商榷

鍾道贊

我國職業教育之設施，不夠堅強，致形成職業教育之貧血症，爲不可掩飾之事實。最初困難所在，爲青年之不重視職業，與社會看輕是類學校，於是影響職業學校之數量的發展。現在之癥結爲缺乏優良適當師資，無論辦理學校行政及擔任教學與工廠、農場、醫院實習之指導工作，均有材難之嘆。十餘年以來，初則致力於專門技術教員之登記，結果應徵者寥寥。繼則舉辦假期講習，受交通時間及程度參差之關係，效果未著。終則採用長期進修與設科訓練之方法，其問題爲數量有限，加以戰事影響，無法控制監督，同時招考學生甚少，發展不易。於是一切設施，陷於停頓，有聽其自行解決之勢。此在不負責任之社團則可，在主管教育行政之最高機關，似無法自圓其說。

吾人研究其根本原因，不外以下三點：(1)求學途徑甚廣，師範職務漸爲人所輕視，不特職業部門如是，其他學科師資何獨不然，且師範又無特異實利，區區公費，不足以誘導人心。(2)建設及政治軍事外交事業，前途廣泛，希望亦多，非迫於經濟或性格興趣，每不欲投入師範之門，與三十年前之尊重師範，歡迎師範者大不相同。(3)教員檢定制，並未嚴格執行，合格教員亦無特殊待遇，一個普通大學或專科畢業同樣享受教書機會，受過專業訓練者並不特別優待。

前國聯考察團批評一般教員，只知道如何教其所不甚瞭解的學科，此種現象，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決非普遍情形。自此報告印出後，頗影響社會人士對於高級師範之觀念。殊不知各地中等學校之現有優良教員，考其學歷，仍多係高等師範出身。抗戰以來師範學院增至十餘所，學生僅五千餘人，其中設備人才俱感困難，入學水準未必均能合理提高，此是各類學院普通現象，不足據以單獨責備師範學院也。

談及職業師資之培養，則並此設施而無之。一般人認爲大學或專科畢業生，即可以勝任愉快，實大不然。大

學固側重理論，專科亦未有充分實習，令其講授學理則可，欲其指導實習則不可。以一個沒有實地工作經驗的教員，無法盼望其能指導學生或與所稱爲『實習教員或導工』發生訓練上聯繫作用，而獲得良好的效果。民國六年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議決議『實習教員與講授教員不可異其人』，針對當時學校流弊，用意極是。惟事實上講授教員不問實習，實習導師昧於理論，二者格格不相入也。建教之密切合作，論者以其陳義過高，難得辦到學理與實際相呼應，此乃是教育上基本要求，理應如是。爲欲達成此任務，特提出左列數點，以供參攷：

一、專科或大學畢業生，具有二三年以上之有關實地工作經驗，有志從事職業教育者，可受短期訓練，修習十六至二十學分之專業科目，如教育概論、教育心理、測驗及統計、教學法與教材研究（包括業務分析）、職業教育、職業指導與職業心理、勞工問題、教育參觀與實習等。其畢業後即欲受此訓練者應於訓練結束後補足二三年以上之經驗，始可從事教育。

二、專科或大學高年級學生，除本科學程外，得利用假期或同時修習專業學程十六學分至二十學分，結束後再補足二年或三年以上之實地經驗。是項學生自其修習專業學程之日起，即予以與師範學院學生同等之待遇。

三、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生一面充當職業學校助理或代用教員，一面仍可修習專業學程，其工作成績優良繼在三年以上者，亦可升充正式教員。

四、職業學校優良畢業學生由校選派國內外工廠實習若干年，以備實習教員之選；其留校充當教員助理多年而成績卓著者亦可升充實習指導員或製圖教員。

五、實業界技術人員，其能力確屬優良而有志從事教育工作者，亦可予以短期講習，充當實習教員，其講習科目可就上述種類增減之。

六、職業學校行政人員，或教育行政機關主辦職業教育人員之培養，可就師範學院各系中之高年級生遴選若干人，修習八學分至十學分之有關職業教育學程，如職業教育之理論與實際、職業教育行政、職業心理與指導、業務分析等。其他院系學生或畢業生除擬充當職業教員外，並欲擔任有關行政工作者，只須於前述各種科目外多修習職

業教育行政及學校行政科目四學分至五學分即可。是種人員其能具有職業學校教務訓導主任或科主任或工廠主任之若干年有效經驗者最爲上乘。

職業教育行政人員之合理條件，爲各種職業專門人才而具有職業教育之濃厚興趣、經驗與研究者，此外凡對職業教理論與實際有深切研究與經驗，同時富有工商各業常識者亦極合適。教育部曾有職業學校校長必須對於學校設科有一種或二種之擅長者，用意即在於是。

論及辦理訓練之機關，則凡歷史悠久院系完整而有師範學院或教育系之大學，如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金陵大學（該校原設有園藝師資組）就其原有農、工、商、醫等院系選擇學生分別訓練，作爲師範學院或教育系工作之一部門。遇有特殊職業或新職業，並須選聘外籍教員或派員赴外國專門學習，以應需要。

總之，職業教育係專門事業之一種，無論教學或行政必須有專門研究才能勝任。以上所述各種方法自非盡善盡美。專業訓練與講習科目之中，最重要者爲教材研究與職業教育行政，前者應以業務分析與職業心理爲根基，後者應以一般教育行政與理論爲依據。曾有人建議成立職業教育師範學院，招收各種學生，統籌訓練。惟欲招收高中程度之學生，予以長期之訓練，則各科職業學生似比師範生或高中學生爲優。惟是種專設學院，如欲包括實習部門則問題複雜，物力人力均所不濟；如僅教以理論，則空泛無益。世界各國師範制度不一，而以訓練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生使適應職業學校之要求爲較多，用意或即在是。一個理想的職業師資訓練機關，一方面各項職業專家，對於職業內容有深切的研究，以爲分析業務、編訂教學程序的導師；一方面教育及心理專家對於學習心理、就業心理、職業測驗及學校行政等有高深研究，以作職業專業訓練的導師。同時應有適當的教學設備，以作示範之用，對於補充實地工作經驗之設施，除基本條件須自備外，其他應與生產或事業機關合作，以求實際也。

今後教育工作之繁複與擴展至爲艱巨。職業教育爲應付經建及軍建需要起見，尤須打破一切困難，迎頭趕上。校數班級之增加，教學實習之改進，在在均賴於健全師資之養成，似不應再蹈過去覆轍，因循敷衍，以誤國家。以

各種可能合理之方法，培養各類高初級職業師資；重視實際經驗與專業訓練，利用一切假期參加實地工作，國內外之考察研究，應視為職教師資之經常設施；寒暑假之講習進修，為一般新舊教員之必要工作；予以特殊待遇，堅其服務信仰，務使職業教育完全上了軌道而後已，此實戰後職業教育之第一要着也。

自由人的教育

陳劍恆

一個自由社會是需要適於自由社會的人來組成的，如果沒有適合於自由社會的人，又那能產生一個自由社會？當然我們不能相信一些愚蠢的人可以組成一個自由社會，同樣的我們也不能相信一些自私的知識份子會組成一個自由社會。因為愚蠢是自由之害，所以美國的前總統架弗遜說：『若是一國希望在文明情形中，對愚蠢和自由兼而有之，這真是幻想！因為過去既沒有這樣的事，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政府的責任雖在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但……若是人民沒有知識，政府也是不能保證的。』但是僅僅有知識而無道德的熱誠，也還是不能組成一個理想的社會。所以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內，特別強調一個國家的衛士，不但要有良好的心智訓練，並且更須有充沛的血性以表現高尚的道德情操。

自由社會的目的是在給組成這一社會的各個份子以應得的自由。然而這個「自由人」的資格之取得，卻是需要兩個重要的條件；一個是心智的力，一個是道德的力。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身體的健康和專門的技巧等等，因為這不是本文的重點所在，所以暫置不論。

那末什麼是心智的力呢？分析的說，心智的力是包括了思考發表判斷和選擇的各種作用，而這些心的作用當然不是各個分立的。平常所謂一個人的智慧，應即是指着這種心的綜合能力而言。這一心智的力是與心理學家所說的智慧並不完全相同，因為我覺得心的綜合能力不是完全決定於先天，而是需要教育來養成的。這心智的力雖然重要，但是如果把心智建築在道德的基礎之上，知識必會終於變成了害人的東西。我記得有一位學者曾說過：「在男女之間，必須一介不苟，方能談自由；在人與人之間必須一介不苟，方能談共產。」這實在是至理名言。心智本

來是只能指示人以解決問題的方向，而目的的達成卻是要以熱情為動力。所以祇有心智而無血性動力，固好像是駕一只有御者而無馬的車；而只有血性動力而無心智所示的方向，也好像是一駕有馬而無御者的車。

所以一個自由人的教育，必是知識和熱情的統合結果。因此如能在教育中，使心智之力和道德之力，能够互相配合發展，得到兩者應有的平衡與和諧，這即是自由人教育的實現。

二

看看現在的學校，是不是能够負起這教育自由人的責任呢？那實在叫人覺得太不夠了。近十年來，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最顯著的缺點，就是忽略了學生思想和道德兩方面的教育。上課只是聽講，考試只是默書，學生少問先生，先生也少問學生。在教師方面，能講演的還是好的，其下者便拿起書本或講義來，逐字逐句的朗誦。我不相信在這種教育下，會養成學生自動思想或是對於問題分析、綜合、判斷、選擇的心智之力。至於說到道德的教育，在小學裏我們則聽到兒童在唱「胖子胖，打麻將（譯音），輸了錢，不認賬。」，在中學裏，我們則聽到「老子兒子」等一類的流言；在大學裏，我們則看到伙食團貪污案和考試的「護航隊」。小學如此，中學如此，大學如此，我們真不知道道德教育今日躲到那裏去了？

當然，在教學和訓育方面，也不是沒有比較好的學校、教師和學生。以上所說並無一概抹煞的意思，不過教育的大體情形是如此。如果即想以此種教育，來為自由社會養成德智兼備的自由之人，那真是緣木求魚了。

三

為了適應自由社會的需要，今日的教育現狀應立刻加以改革，不容許再糊塗的繼續下去。綜合的說，今後教育宗旨應當是明明白白「為自由社會造就自由的人」。分析的說，自由人的養成，在心智方面必須使學生能對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問題，有觀察、判斷、選擇的能力；在道德方面必須使學生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利己利羣的責任。

心和支持是非的正義感。但是，要想達上述的目的，現在學校的課程和制度卻不能不加以改變（此地所謂改變，不是僅從形式上，也是從內容上着想）。譬如今日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最高原則究竟是什麼？我們必須把這些東西做為教材的骨架，使學生能透過這些東西，而對於眼前的社會問題，得到一明晰的觀察和判斷。因此我覺得眼前的只是堆積零碎資料，缺少指導原理，並且與實際生活失去聯繫的課程，必須大大加以改造。使片斷的、靜的、死的教材，變成系統的、動的、有生命的東西。但是在這裏我有兩點聲明：就是上面我說要把指導社會諸般問題的原理放在課程裏面的意思，並不是說要把中國古老的傳統放在裏面。因為我始終懷疑農業社會的東西仍然可毫無變更的適用於一個新民主的社會。其次，我覺得指導社會諸般問題的最高原理，是不應當由某一「聖經」來決定，而實在是應由人民在自己生活的體驗中提供出來，而且我們還應當保留「在學校裏學生可以對各種問題有補充發明的自由」。從上面的話裏，我可以說明我自己對於傳統的古老意味的教育和聖經式的自上而下的一黨教育是反對的。

至於說到道德教育方面，我總覺得導師制還應當是一個可行的東西。固然在過去，導師制的試行是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但是這應當是人的方法的或環境的問題，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我們知道導師制在英國牛津劍橋等大學，有着極好的收穫。固然他們之所謂導師制，並不是形式的管訓；但是道德的影響，常是由於一種潛力的感化，祇要師生能在學問的熱誠上多有接觸，自然無形中會給青年以極大的道德啓示。

美國哈佛大學在一九四五年出了一本書，叫「自由社會中的通人教育」。這是十二個教授對於改造戰後美國教育的研究報告。這報告中所擬的方案，不但可能成為哈佛大學改進的藍本，也可能成為今後美國全國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南針。原來美國的教育，在近些年來，就課程說，感覺有過分分化的趨勢；在中學方面，規模較大的學校，都採取分科制度（例如職業科、商業科、普通科、理科、或升學預備科等）。在大學方面，即以哈佛而論，全校三十一系，約有四百餘學程，而其中卻幾無一學程是為全體學生共同所必修的。這種事實使教育在它的功用方面發生了脫節現象。因為除掉專門學術和生活技巧的陶冶而外，一個民主國家教育的最大目的，應是為自由的社會造就通達的自由人。現在美國的中學和大學既然多將注意放在課程的分化方面，結果必致使受教育者，在一般的心智和道德訓

練方面，反而感覺不足。而這種缺欠，卻又非從學校教育方面想法補足是不可的。因為許多教育的勢力，如宗教、家庭、鄉村等，在舊日原有左右人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的，在今日卻都隨着社會的變化以俱去，而不復再有統合國民思想和道德的功能了。所以哈佛大學的十二個教授，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主張必須就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個範圍內，規定中學和大學的共同必修科目，以避免因課程過分分化而引起學生對於社會統盤問題的隔膜。當然，這所謂共同必修科，不僅是一個課程形式問題，也是與教材的內容，教材的編排，以及教學方法有着密切關係的。在報告中，他們也極注意到道德的訓練問題。在原書的第二章和第四章中，都特別提到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使人有好的知識，也是在使人能做好人。所以他們特別注意學生在文學方面的修養，因為文學實在是比聖經更有感化人的力量。在第五章中，他們也曾對於大學的導師制提出改良的建議。他們說如果導師制僅是幫助學生應付學科考試，那就不如乾脆不要導師制。他們為導師制的施行應當注重在學術的研討和論文的客觀批判。雖然這與中國所謂管訓性的導師制在意味上是不同的，可是因為在這種學術性的導師制下，學生對於教師研究學問的精神和熱誠多有接觸，自然會從治學態度和方法中間，得到做人的態度和方法。所以可謂寓訓於學。

四

總結以上所講，我的大意是：今後中國的教育目的應是「為自由社會造就能自由的人」，而自由人的教育則有賴於心智之力和道德之力的養成。所謂心智之力乃是指着對於社會諸般的問題的思考、發表、判斷、選擇的作用而言。但是這心智之力却又應建築在道德之力的基礎上，不然心智便終會變成了害人的東西。可是要想達到上述的目的；我們必須對現在的中學大學課程在形式和內容上有所改革。而且教學的方法也應一反「以教師為主」的被動方式，而採取「以學生為主」的自動方式。再就是導師制也必須徹底改善而加以施行。

大眾的明智和道德，是民主社會的兩大支柱。沒有明智和道德的人，大至於選擇政治領袖，小至於選擇婚姻對象，都會失去判斷的標準，而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是萬不會在大眾的愚蠢和自私中得到生長的。在哈佛大學「自

由社會中的通人教育」一書中，我覺得以美國人今日國勢之盛，美國的學者尙嫌他們的教育沒有充分盡到教育自由人的責任。那末我們反觀今日中國的現狀，處在幾千年以來青黃不接的大變局中，站在進步和危難的十字路口，對於教育豈不是更需要大大的加以改革嗎？在民主的號召中，我們將怎樣教育我們的自由人呢？這實在是今後中國教育界的一個中心問題。

欣賞教育

吳蘊瑞

欣賞二字，久已不為討論之對象。尤在過去抗戰之七八年頭中，朝野多提倡刻苦工作，諱言欣賞，以為娛樂足以妨害工作。實則，工作愈緊張，娛樂欣賞實愈需要。不觀近年各界平時之生活情形乎，一般公務人員，工商各界，其所自作樂者類以撲克及竹林之戲為最普通，夜以繼日，興味濃厚，其中以之為娛樂消遣者，固佔大多數，而留連忘返，藉事賭博致傾家蕩產者，亦不在少數。足見娛樂之不可少，而能以欣賞為娛樂者，實不多見。此無他，一般人多不會欣賞，無力欣賞或無物可供欣賞之所致。曩見滕白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行畫展會場之對面，有人舉行結婚儀式，到來賓數十人，衣冠楚楚，並非下流。儀式前後，竟無一人涉足展覽會者，實堪驚異。考其原因，實由人民欣賞力之欠缺，與歷來欣賞教育之不注意。茲將欣賞之各種基礎與關係分析如下，以供給教育者之採擇：

一、欣賞之哲學的基礎——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此固為一般社會學及教育界所提倡者。然人生何能專事服務？倘專事服務而無享受，則人生即屬苦事，人將視生活為畏途，而趨消極。故人生應一方面服務，一方面享受，二者不偏廢。論及享受，當然飲食男女之外，不能離開欣賞。因飲食男女即動物亦有之，而欣賞一端，則為人類所獨具。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人類究竟與動物不同。論語云：人為萬物之靈，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固指理智道德而言，但亦包括欣賞一端。人生無欣賞則生不如死。美國杜威之教育目標，在豐富生活，當然所謂豐富者，非止衣暖食飽而已，其中有欣賞之意味在焉。

二、欣賞之神經生理基礎——欣賞物之刺激，固由感官達腦脊部而生感覺。而此感覺之影響，則由自動系統之頭部與骯部，及於此二部所管之器官，如呼吸系統、循環系統、消化系統等。其結果為體呼吸平靜、心跳和緩、脈壓降低、消化工作旺盛，使身體受益。反之，此等系統一方面受自動系統胸部之影響，傳導煩、惱、懼、怒之感

覺，使呼吸急促，心跳力速，血壓加高，消化停止，消耗人之精力。自動神經之系統，胸部，與頭部及骹部之功能相反，早為神經學家所發明。欣賞之精神生理基礎，即為使頭部與骹部感受美的感覺，以打消於胸部之不快感覺，使身體頭骹起有益之功能，培養身心健康。彼患神經衰弱症者，易於發怒，消耗精神；從神經生理學方面看來，即兩部與胸部之不平衡，頭骹兩部不能控制胸部之作用為之也。欣賞足以強頭骹兩部，使神經達健全之境。

三、欣賞之對象——欣賞之對象種類頗多，衣服、飲食、起居均可為欣賞之對象，但作者所說之對象，須同時合於以下四條件（1）於精神之修養有益者，（2）於身體精神兼有益者，（3）不多消耗金錢者，（4）意味深長者。依據此四種條件而選擇，惟有音樂、藝術、遊戲、運動最為合宜，其中以藝術之包涵為最廣，如書畫古董是也。

四、欣賞與個人事業之關係——第二節已述神經生理之需要欣賞以調節身心，其理甚明；但世人往往不明理，不知養成正當的欣賞習慣。有用其餘暇作麻將撲克之戲而從事賭博者，有好探花問柳以遂其聲色之慾者，非喪亂神志，即耗費金錢，甚至傾家蕩產，身敗名裂，事業失敗。在中國社會中習見之現象，尤在過去八年抗戰之中，公務人員及一般士大夫公餘之暇，以麻將為無上消遣之品，雖大半能免避賭博性質，然絕不能如尋書玩古，愛好音樂、藝術、遊戲、運動之於身心有益也。中國古代達官顯爵非能書畫，即能詩文。在前清時代，文人士大夫尤好書、畫、古董，其欣賞高尚，其功名事業，成就亦大。欣賞之於一人之事業成就，實大有關係焉。

五、工業化之社會需要欣賞——一國之工業愈發達，鄉間與城市人口之分布愈起改變，即城居者愈多，鄉居者愈少，於是城市消遣之問題以起。一方工業愈發達，人民空閒時間愈增多。蓋在農業社會，人民自朝至暮，終日在田畝之間，空閒時間少。其在工廠中作工，因工作緊張，身體偏用，疲勞易起，不能久留，所以工作少則六時，多則八時，空閒時間以增，消遣問題於是迫切。故歐美工商發達之國，電影戲院林立，工廠之外，更有公園、遊戲場、博物館之建設，以供市民之消遣與欣賞。倘無此種消遣與欣賞中心，則工人之身心無以調節，頗能影響工作之效率與生產之量額。國人每談工業化問題，輒係一知半解，常遺漏消遣問題而不談，實未明欣賞與工業之關係。任何人都知德法兩國工業品之高出世界，不知德、法兩國人之欣賞音樂、藝術之程度，亦高出全世界。美國亦為工

業化國家，中等教育之七項目的，有善用餘暇一條，實所以應工業社會迫切之需要。吾國人不講工業化則已，欲談工業化，非先提倡欣賞教育不足以樹其基礎。吾國人從前的講究欣賞，故歷代古董、書、畫，聞名世界，然所欣賞者，限於少數之士大夫，今後則須設法普及於大眾，方能與工業化國家之政策配合，此欣賞教育之所以不能不積極提倡也。

六、如何辦理欣賞教育——二十年來吾國之中小教育，專以預備升學爲目的，課程偏重國、英、算三項，其他如德育、體育多置腦後。欣賞教育更談不到，結果養成偏狹專門之人材，不適用於近代工業社會之生活，近聞某公立中學，擔任音樂藝術之教育爲某大學史地系畢業生，一學期中上課次數不及半數，坐領乾薪，學生因鑑於國、英、算之重要，利用此種缺課時間，集中精力，學習此等功課。反以缺課爲方便。將來此種學生升入大學，畢業之後，將如何利用餘暇，其不從事於麻將撲克者幾希。此種破殘之教育，實未足以應將來國家社會之需要。欲使青年合於工業社會之生活計，現在中學課程中少數之音樂、圖畫等功課，尙不足以養成欣賞之習慣，故各級學校，應在功課之外，每學生應有參加歌詠、圖畫、音樂之機會。此外，又須請國內藝術家來校展覽講演。凡屬故宮博物院等陳列品，應率領學生時往參觀，更由教師加以解釋，使其真正之價值以培養欣賞之心。至於社會方面，則各省市在民衆教育館之外，更宜闢地方博物館，以便就業市民之欣賞，俾社會與學校有適宜之配合，完成欣賞教育之機構。三十年來，中國之古玩、書、畫之流入外國者，年以千萬計；留在本國者僅上海、北平古玩舖所存近代製品而已。以後中央地方如何收買此等藝術作品，作提倡欣賞教育之材料，不能不從早計劃。抗戰以來，一般藝術家多能努力從事，出品倍於戰時，以後中央地方教育機關，應擇其精品，盡量收買作地方藝術館之材料。與古代書畫古董彙爲大觀，作一般民衆欣賞展覽之用，以替代麻將撲克等不正當之消遣。此實爲準備工業化國家教育之基本工作，不容再緩者也。

吾國號稱文明古國，科學不如人，當不足爲羞，倘國民道德不如人，文化程度低於人，則實爲奇恥大辱。抗戰勝利以來因內亂頻仍，吏治不良，財富重行分配，向來處於領導地位中等知識階級，現頻破產，喪其自尊之心，而

一般無知識不會欣賞之暴發戶，將成爲社會領導人物，平日花天酒地，麻將撲克在社會上造成濃厚之惡劣空氣，傷風敗俗伊於胡底，若不見機挽救，將來社會必有劇烈之變動，有搖國本，危及民族。今後國內有識之士以及內政、教育兩部宜如何設法改正此種風氣，挽回此種潮流。據作者所及，提倡欣賞教育，亦是一法。因中國文化一方面寄託於和平之政治哲學以及詩、書、歷史、詞曲，一方面寄託於歷代之藝術作品，如三代之銅器，漢代之陶器玉器，自晉迄今之書畫，自唐迄清之盜器等藝術作品，可直接用視官使人醉心，收效之速，影響之深，無與倫比；可以使富者易其好，貧者安其位。孔子所謂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境界，欣賞教育有此功能，望教育當局及一般教育界特予注意焉。

世界教育專業組織之誕生及其使命

常道直

出席世界教育專業會議之報告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至卅日在美國紐約州安迭哥特(Endicott)舉行之世界教育專業會議(World Conferenc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係由美國全國教育聯合會首先發起，邀集世界各國之全國性的教育團體，共謀增進全世界教育專業界之權益，並促進國際的了解。與會者（按第一字母順序）有玻利維亞(Bolivia)，巴西(Brazil)，加拿大(Canada)，智利(Chile)，中華民國、考斯他黎加(Costa Rica)，捷克(Czechoslovakia)，多明利加(Dominican Republic)，厄瓜多(Ecuador)，埃及(Egypt)，愛爾蘭自由邦(Eire)，薩爾瓦多(Salvador)，英格蘭、希臘(Greece)，海地(Haiti)，伊拉克(Iraq)，冰島(Iceland)，墨西哥(Mexico)，荷蘭(Netherlands)，北愛爾蘭(N. Ireland)，挪威(Norway)，祕魯(Peru)，波蘭(Poland)，蘇格蘭(Scotland)，瑞典(Sweden)，瑞士(Switzerland)，南非聯邦(Union of S. Africa)，美國第廿八國之代表共計五十六人，美國國務院，聯邦教育局，以及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聯合國總部，均派員參加，足見該會議之被重視。

會議中分設五個專門委員會：其一、規劃全世界教育專業之組織；其二、擬定國際了解教學之方案；其三、設法協助被戰事破壞區域內教師兒童之救濟及其教育之重建；其四、建立教師組織與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之關係；其五、起草關於提高教師地位兒童福利及改進教育以適應現代問題等決議。

以上各委員會所處理之問題，多半皆由美國全國教育聯合會事前徵集被邀請各團體之意見加以整理作為商討之依據，故能節省各代表之時力不少。臨時提案比較甚少，我國代表臨時提案為「制定世界教師專業道德規約」(An Internat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期由全世界教師之自由的進德修業，提高其

社會的地位。筆者在大會中之致詞，亦以此為題，全文載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中，茲從略。此案業由大會接受，將於下屆大會中完成制定程序，以資共同信守。

大會於八月卅一日一致決議成立永久性之「世界專業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茲將其總章譯載於後。

世界教育專業組織總章(草案)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世界教育專業會議在美國紐約州安迭荷特通過。

第一章 名稱

本組織之名稱定為世界教育專業組織

第二章 宗旨

本組織之宗旨為獲得全世界教育專業界之合作，以期達成：

- 一、使高度完善自由之教育普及於一切人民，無有差別；
- 二、增進全世界教師之專業地位，及促進其智能的、物質的、社會的、公民的權益；
- 三、依據正確的知識，在教育上奠定國際合作基礎，藉以培植善意，促進世界和平；
- 四、對於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性的機關之有關部門，提供關於教育專業事項之意見。

第三章 會員

本組織之會員，分為五類如後：

- 一、國家會員——凡全國性之教育專業組織，其入會申請經世界組織執行委員會先行認可，復經世界組織代表大會之最後核准者屬之。
- 二、國際會員——凡有意合作之國際性的教育專業組織，其入會申請經世界組織執行委員會先行認可，復由世界組織代表大會之最後核准者屬之。

- 三、聯繫會員——(甲)凡區域的(聯邦國家所屬)州或地方之教育專業組織，其入會申請得其所與聯繫之國家會員之同意，經世界組織執行委員會先行認可，復由世界組織代表大會最後核准者屬之。(乙)凡大學學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機關以及從事教育問題之科學研究會社，其入會申請得其在所在地點之國家會員同意，經世界組織執行委員會先行認可，復由世界組織代表大會最後核准者屬之。

世界教育專業組織之誕生及其使命

四、個人會員——凡接受本組織之宗旨，並欲對之有所貢獻，取得本組織刊物，並列席公開會議者屬之。
五、名譽會員——本組織執行委員會所欲對之表示敬意，或請其參議會務者屬之，其人數在同一時期不得超過二十五名。

第四章 機構

本組織設代表會議、執行委員會及秘書處。

第五章 代表會議

一、代表會議每年舉行全體大會。

二、代表會議包括國家會員、國際會員與聯繫會員所委派之代表，以及本組織之名譽會員。

三、代表會議之職權為：

（甲）決定本組之工作程序與政策，並審議執行委員會之報告；

（乙）選舉執行委員會；

（丙）選舉本組織之主席及副主席；

（丁）審核本組織之預算，並付諸實行。

第六章 執行委員會

一、執行委員會包括本組織之主席、副主席，及代表會議所選舉之五人。主席副主席及其他委員之提名，應由國家會員於代表會議年會開幕前至少三十日以書面提出。

二、執行委員會辦理本組織之事務，實施代表會議所認可之政策。

三、執行委員會任用秘書主任，並規定其薪俸及服務章則。

四、執行委員會經營本組織之款項，並責成秘書主任對於此等款項之收集、保管、支出及帳目之妥慎處理。

五、執行委員會代表會議年會之審核，得接受捐款、贈與或補助費，用於第二條所列之宗旨。

六、執行委員會對於代表會議及年會之時間與地點，以及總辦事處之地址，得作最後之決定。

七、執行委員會對於代表會議所採取之政策以外，臨時所發生之問題，得代行本組織之職權。

八、執行委員會編訂代表會議，及年會之暫定議事日程，並向代表會議提交前後兩次會議中間時期之詳盡的會務報告，包含經過核算之財務報告在內。

九、執行委員會委員，包括主席及副主席在內，選任期間爲二年；惟在第一屆選舉時主席與委員三人之任期爲二年，副主席與其餘委員二人之任期爲一年。

十、遇主席死亡，或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席繼任主席職務，迄至代表會議下屆開會時爲止。

第七章 祕書處

祕書處設祕書主任及其所需之有給的助理人員而經執行委員會准許者。

第八章 代表

一、國家會員每兩千會員或其半數以上得派代表一名，惟此類會員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亦不得超過五十人。

二、國際會員得派代表五名。

三、聯繫會員得派代表一名。

第九章 代表會議之表決

世界教育專業組織，期望一國家內均有一個一統的教師組織，一俟此目標達到，則代表會議中之表決，即可定爲每一國家一票權。但在現狀下暫依下列辦法：

一、國家會員每五萬會員或其半數以上得投一票，惟此類會員之票權，不得少於一票，亦不得超出五票，每一國家會員應享有之票權，均由代表團首席投之。

二、國際會員有一票權，該票應由代表團首席投之。

三、名譽會員及聯繫會員之代表有發言權，但無投票權。

第十章 會費

一、國家會員應付之年費按每一會員美幣兩分計算，惟此類會員所納之費不得少於一百元。

二、每一國際會員每年納會費二百元。

三、甲類聯繫會員所有會員人數爲五百或少於此數者每年納費十元；人數在五百以上但不足二千者納年費五十元；人數在二千或二千以上者每年納費一百元。

四、乙種聯繫會員每年納費二十五元。

五、個人會員每年納費二元。

世界教育專業組織之誕生及其使命

六、名譽會員免納會費。

七、會費均以美國通貨計算。

〔注意〕此係暫定譯文，供本會會員研究之用。前項總章草案一俟被邀請參加之全國性的教育團體十個加以批准，即發生效力，並由籌備委員會宣告世界教育專業組織正式成立。

世界教育專業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全體大會所通過之「關於國際了解教學之建議」，堪稱爲人類教育史上一重要文獻。在委員會中所謂「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之代表間，對於消除種族歧視（美國與南非聯邦國內的種族問題引起各國代表之注意），以及「地上天然資源應依國際的計劃開發」等問題，自難避免若干爭執；但世界各國的教育者畢竟是比較開明而有遠見的，最後總能够在國際了解之大前提下得到一致的結論。

茲將此項建議之要義，簡括譯載於後。至對於各科教學之比較具體的提示，請參閱本刊專載之原文。國際了解之教學，以啓發爲人類共同福利而通力合作之理想爲鵠的；教師當使生徒均能以下列各原則爲其行動之依據，並使之貫徹於人類關係之各領域中：

- 一、人類之基本需要衣、食、住、健康、娛樂、安全等等均能獲得滿足。
- 二、人人對於體格、知識、社會各方面之發展，均應享有同等機會，不容有所歧視。
- 三、真理之追求，與意見之發表，除非妨礙他人之權利，不受限制。
- 四、尊重人類生命，以及其他民族之宗教信仰。
- 五、各民族不得以任何藉口自恃優越，將其文化強加於他種民族。
- 六、地上之天然資源，應依國際的計劃與合作式開發之，用以增進全人類之共通福利。
- 七、科學之進步已使全世界人民成爲比隣，相互依存日甚，從而對於彼此之福利，當負起道義上之責任。
- 八、各個國家之安全，自治權利，文化發揚，經濟繁榮，惟有在一實力足以維持和平並利導全世界經濟合作之組織下協調努力，方能實現。關於世界教育專業組織與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取得聯繫問題，已獲具體

結果。該專門委員會並建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各國教育團體應竭盡所能，達成教師地位之提高，並促進其智能的、物質的、社會的及公民的權益。

關於被戰事燬壞地域之援助問題，我國代表因未能獲得可靠資料，對於會內外許多友邦人士之善意的詢問，自無從作正確之答覆。該委員會鼓勵各國之教師團體以一切方法迅速援助被破壞區域內之兒童與教師，並建議在各國內成立一委員會，專事推動及統合此項援助工作。

附錄

本會理監事會重要決議摘要

中國教育學術團體第四屆聯合年會於三十四年暑假在四川北碚舉行。本會於三十四年六月六日召集沙磁區會員舉行座談會，擬定年會提案，分爲：（1）戰後學制改造問題，（2）憲草教育章問題，（3）戰後新教育政策之確立問題，（4）戰後教育實驗研究之擴充問題，（5）戰後邊疆教育問題，（6）戰後女子教育問題，（7）戰後教育復員問題等類，由各會員分任起草。

六月二十三日，七月三十一日繼續開會詳加商討。

三十四年六月十日（上午假沙坪壩南開中學舉行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定以「戰後教育計劃及復員」爲年會討論中心問題，並通過新會員楊宗萬、胡士襄、吳耀麟、廖秀青、陳秀清、沈其達、張超、蕭毓秀、高恆嶼、劉眞、劉培成、朱芳春、慈連炤、張孟獻、高振英、潘廉方、李元魁、張呈龍、蔣信、莊肅襟、陳俠、沈慶華、孫天泰等二十三人。

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上午八時，在北碚就聯合年會會場舉行本會第八屆會員大會，議決修改本會會章：第九條改爲「本會理事會由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之代表（每團體一人）公推理事十九人組織之，計劃本會事宜，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第十條改爲「……監事七人，……」選舉結果，常道直、李蒸、朱經農、張伯苓、許恪士、柯育甫、莊澤宣、艾偉、歐元懷、邵鶴亭、陳禮江、李清棟、謝循初、陳劍恆、馬客談、鄭鶴聲、鍾道贊、陸殿揚、林本等十九人當選爲理事，蕭承慎、曹芻、王衍康、廖世承、童潤之、孟黨承、羅廷光七人當選爲候補理事，黃敬

思，黃任之、姜琦、蔣夢麟、趙迺傳、吳南軒、楊衛玉七人當選為監事，章益、吳俊升、陳劍脩、邱椿等四人當選為候補監事。

同日下午一時舉行本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推定張伯苓、常道直（兼文書）、許恪士（兼會計）、朱經農、李蒸為常務理事，黃敬思為常務監事。

推定常務理事為本會出席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代表。
議決本會今後工作要項，包括教育調查、研究、籌建基金、籌募會所、及準備參加國際教育會議等。

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假沙坪壩南開中學舉行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增加會費如下：（一）個人普通會員每年二百元，（二）個人永久會員二千五百元，（三）已為永久會員者，請其樂捐二千元至二千五百元之數，（四）個人會員入會費五百元，（五）團體會員每年一萬元。

決議審查本會年報稿件辦法。

通過新會員：林振鏞、李長之、李久澍、杜鋼百、楊克敬、鄭鶴聲、司以忠、程熹如、倪友蘭、董公問、劉桂灼、王學孟、史國雅、馬秀文、吳廷勸、李德揚、艾和薰、鄒光啓等十八人。

三十五年四月六日假重慶中央團部舉行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組織台灣教育考察團。

推定常理事道直赴美出席世界教育專業會議。

通過新會員：張國維、李旭、李至純、于彥勝、周家楣、范冰冰、黃堅厚、李象偉、曹治德、楊質彬、蔡綺寬、艾國英、沈奠國、吳國樑、蘇惠鏗、林紹賢、孫致和、黎少達、唐秉玄、鄭騰輝、徐康寧、辜遠、朱家澤、郝士英等二十四人。

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假南京勵志社舉行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推請常務理事兼文書常道直赴美出席世界教育專業會議，所遺職務由許常務理事恪士暫代。

同年十月十四日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議，籌備組織台灣省教育考察團，並請郝更生先生赴台灣省視察時，與該省當局面洽一切。旋經商定，由台灣省教育處擬定「邀請中國教育學會各專家蒞台考察辦法」，內容包括委托本會收集教育資料，舉行學術講演及實際考察各項。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假南京教育部會議室舉行台灣教育考察團預備會議，接受台灣省之邀請，決於三月中旬赴台。俟以該省發生事故，暫緩成行。

三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假南京省立江寧師範舉行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世界教育專業組織總章（草案），並決定參加該組織為會員。

決議發動南京及各地會員研究並擬定聯合年會之提案。

關於本會會費，經會商暫行改訂如次：

(一) 普通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各為五千元。

(二) 永久會員——一次激足會費五萬元。

(三)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十萬元。

會中並推定各地會員共五十人，請其協助成立各該地分會。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假南京教育部會議室舉行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決定本會本屆年會舉行日期及籌備委員人選。同時並推定本會出席本屆聯合年會代表人選。

決議請郭有守會員代表本會參加世界教育專業組織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本

年之成立大會，改定本會英文名稱爲 China Education Society。

推定李蒸理事兼會計。

決定舉辦本會會員總登記，請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教育通訊刊載登記公告。

通過新會員，計汪養仁、洪心衡、高時良、馮邦彥、張俊玗、林芝崖、徐君梅、張蔭椿、魏承駒、董開統、薛克禮、游大涵、戴景曦、林彥嘉、許元培、林春生、林浩藩、楊展倫、陳昭時、劉季伯共二十八人。

會中經費困難，目前急需之款由此次出席之理監事各樂捐二萬元，計十三人共得二十六萬元，以資維持。

×

×

×

三十六年十月一日假南京江寧師範會客室舉行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與本會三十六年年會第二次籌備會合併舉行，決議增加年會籌備委員爲廿四人；團體會員請其在常年會費之外加繳年會費伍拾萬元，個人會員參加年會者須繳年會費三萬元。

通過新會員，計：易价、何士驥、禹瀚、周戒沉、郭俊卿、張德興、汪震、凌洪齡、劉文林、張開運、董蘊玉、何以龍、費哲人、余策駢、方德長、蕭廣元、宗福僧、孫昌吉、景時春、陳毓瓚、梁紱生、朱雙玉、張達善、王晉齋等二十四人。

編後附言

本會首期年報得中華書局之合作，於三十三年十月在渝出版。振作教育研究之空氣，便利同仁間意見之交換，一時頗為教育學術界所重視。迨抗戰勝利來臨，本會理事會即議定以教育復員與光復區教育之再造為三十四年年報之主題，並已徵得一部分文稿。惟因當時各方面均忙於復員，且認為印刷所需器材以在京滬較易設法，故有暫緩付印之議。不意三十五年復員還京以來，遭遇種種不能克服之困難：本會限於經濟能力，既無法自行印行，而出版界亦多苦於紙張短絀，印工高漲，以致遷延至今。茲幸仍商得中華書局之同意，慨允繼續擔承本年報之印刷及發行，始得與教育界同仁及一般讀者相見，深感慶幸！惟因受時間性之限制，一部分專論教育復員之文稿，因時過境遷，不得已而割愛，尚希原惠稿諸同仁諒察是幸。

本會復員後之第一次年會——即本會成立以來第九屆年會——預定於三十七年一月初舉行，當為本會會務積極開展之始點。而本年報之重要性，亦將與年俱增。深信本會全體同仁以及社會重視教育研究之人士，必能多方策勵，通力合作，使本年報此後得以每年按期出版，質量俱進，俾能與美國教育研究社之年報（自一九〇二年創刊至今從未間斷）相媲美，中國教育界幸甚！本會幸甚！

綜計本年報各篇文字，均屬針對今後教育各方面的建設而發。舉凡本會今後使命，教育學術界努力方向，大學教育，高等師範教育，中等教育，民衆基本教育等問題，靡不一一論列。執筆者均係本會會員，多為國內教育名家。篇末殿以世界教育專業組織之誕生及其使命一文，係編者奉派出席去年八月間世界教育專業會議之報告。

附錄二件：其一為該會議最重要收穫之一，堪作同仁之研討資料；其二為本會理監事會重要決議摘要，藉供本會同仁查攷之用。

本報之編輯，曾由本會各常務理事分任閱稿之勞。李季開先生從徵稿、編輯、校閱，以迄接洽印行，始終其事，所費時力至多。由於舒新城、姚紹華兩先生之助力，中華書局並予以種種印行之便利。於此均應一一代表本會合併申謝。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常道直謹識於南京

中國教育學會啓事

一

本年年報，由本會商由中華書局印行。凡本會會員，由會介紹購買，概以八折優待。

二

本會近以各地會員自勝利復員以來，地點變更，通訊地點多有不明，爰特舉行全國會員總登記，以備彙印通訊錄。至希各地會員即將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入會年月，現在服務機關，通訊地址，主要著述，以及對會務意見詳細填明，於三十七年一月底以前寄交南京四牌樓中央大學教育系胡士襄先生彙收。



o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be established within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and that until such a committee is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delegates to this Conference urge the associations which they represent to take appropriate informal action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ideas and information in respect to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VI.

Finally, this Conference urges that each one of its members aid in giving wide publicity to the foregoing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We especially urge that delegates publicize the recommendations among the teachers of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and that they take all appropriate steps to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schools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

*

*

姚紹華主編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教育界

月刊 每逢十五日出版

介紹教育學說 研究教育問題
 報道教育動態 輔助教育建設

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中國教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特輯

行憲後的教育……

李蒸

教育爲什麼要配合行憲……

楊宗萬

行憲須先提倡公民教育……

龔啓昌

中國民族復興教育的理想……

陳科美

新時代的教育行政……

羅廷光

如何改進省教育行政以配合民主化學術化之需要……

袁伯樵

日本再教育問題……

程時燧

由胡適的「大學計劃」說起……

周憲文

高級師範教育改進問題……

周作福

美術課程中的圖和畫……

朱蘇典

資格文憑的價值在那裏……

董渭川

大夏大學的西遷與復興……

歐元懷

在「丹村社教實驗區」服務的觀感……

汪彥山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實價一萬元

experi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need for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education requires new areas of specializ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new experts, with continual scientific appraisal of prevailing practices including evaluation of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s Conference, therefore, recommends:

- (a) That research be undertaken into the bases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nversely, into factors detrimental to such understanding — such study to includ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factors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outstanding “world citizen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 (b) That systematic efforts be mad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techniques a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and use of 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 (c) That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s’ home backgrounds on their international attitudes be carefully studied.
- (d) That the bes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the guidance of foreign students be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 (e) That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 emphasized in universiti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investigations into methods of teach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 (f) That studies should be made as to ways and means of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roles of universities and as to the fea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g) That summer courses and institutes be established for training teachers to teach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II.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that an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to render tributes to great men and women of all nations, and to create a sense of human brotherhood.

- (d) That films and recordings which are tru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various nations be produced, and that these films and recordings, with suitable adaptations in language or otherwise, be freely exchanged among schools of all nations.

13. *On the Work of a Central Office of Documentation and Exchange of Materials*

Various agencies are now in existence for the collection and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among nations and additional work of this type is expected to be undertaken by UNESCO. The activities of such agencies are already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in our opinion, they could contribute even more if the proper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them w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Conference:

- (a) A central office should be set up with liaison offices in every country to collect and distribute internationally such materials as reference books, treatises, textboo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designed to be read by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fessional aids for teachers on curriculum problems and instructional methods.
- (b) Teacher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election of all kinds of material. While the main task of distribution should be entrusted to the proposed central office and the liaison offices, teachers' organizations might also serve as media of exchange.

14. *On Research, Experi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Modern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ideally based on research,

countries be revived and expanded.

- (d) That governments be requested to improve fac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by revision of passport and visa regulations and sailing permits and by aiding in reduction of rates for educational travel.

12. *On the Educational Uses of Modern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press, the radio, the cinema are instruments not only of amusement and recreation but also of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is limited only by the extent of literacy; the radio lea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to inform and inspire all who have ears to hear; the cinema teaches its lessons, wholesome or detrimental, with a power and persuasiveness beyond those of the most skillful teachers and the most highly organized educational systems. These, and other modern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ve in the past and may in the future work either with teachers or against them in their effort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is Conference, therefore, recommends:

- (a) That teachers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s endeavor to enlist the public press, the radio, and the instruments of visual education as potent allies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eir purposes.
- (b) That the press, radio, film, recording, and television be used within the school to dramatize and invigorate the process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 modern world and that schools be furnished with the equipment needed for this purpose.
- (c) Th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to schools be arranged and that such programs be used to celebrate events of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to give hospitality to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during vacations.

- (e) Expansion of present practices for student exchange, which should include college students, secondary-school students, and possibly elementary-school students, without neglecting adult education.
- (f) Vacation trip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foreign countries,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school auspices.
- (g) Establishment of youth camps, which might eventually become international parks, along the common boundarie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 (h) Facilitation of visits to youth hostels by studen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11. On Teacher Travel and Exchange

The individual teacher must be internationally informed and worldminded if he is to be an effective ag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n the classroom. To this end,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need to have more first-hand contacts with the peoples of foreign lands.

To further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teachers,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 (a) That ample facilities for systematic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teachers be provided.
- (b) That teachers' associations play a large par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ograms of teacher exchange, that governments provide such associations with funds for helping to carry out such programs, and that a committee of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be established to cooperate with UNESCO in this field.
- (c) That travel bureaus of teachers' associations in different

increase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like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within a nation, can be effective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citizens are capable of keeping themselves constantly informed on world affairs, and of contributing their views to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For these purposes the citizen's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is a minimum requirement.

In the light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efforts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gencies to combat illiteracy and promote mass education are commended by this Conference, which further calls upon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to cooperate in such efforts.

10. On the Relations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value of direct experience as a means of learning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y educators. Although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have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by the facts of geography, more limited than are corresponding opportunities in other areas of learning, there are, nevertheless, many ways by which the values of learning by experience can be utilized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means which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eachers in all countries are the following:

- (a) Correspondence amo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 (b) Exchange of student-prepared exhibits including such items as letters, cards, stamps, newspaper clippings, art exhibits, and schoo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 (c) Encouragement of students in one country to send gifts and provide other practical help for students in other countries.
- (d) Provision for schools and student groups in one country

This Conference further urges teacher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s to go beyond the negative action provided for in the UNESCO proposals by taking constructive steps to have included in the textbooks used in the schools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content which supports positively the ideal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world understanding.

This Conference rejects the idea of a single textbook, internationally prepared for use in all countries, as being impracticable except perhaps for a textbook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a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lso, in the opinion of this Conference, it might be feasible and desirable to have some internationally prepared handbooks for teachers on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scope.

8. On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Teaching Practices

Teachers in all countries can improve their programs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f they know more fully about the corresponding programs and practices which prevail in lands other than their own.

This Conference, accordingly, commends the 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et forth in the memorandum entitle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Schools,"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f UNESCO. This Conference, further, calls on teacher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s in all countries to suppor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committee proposed in that memorandum.

9. On the Extension of Literacy

Campaigns to combat illiteracy and to promote mass education everywhere on the face of the globe merit the active support of teachers for many reasons —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being the contribution which the extension of literacy can make to the

of the creative artists whose work they study.

This Conference, therefore, recommends:

- (a) That art education include instruction about the creators of art as well as about works of art, such instruction to include the lives of artists and their respective peoples; and that the same principles should apply in the case of music education.
- (b) That art study should include not only painting, but also architecture, crafts, and other creative work characteristic of a country.
- (c) That folk lore and folk music from foreign lands be included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of each country.
- (d) That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include attention to the finest examples of creative writing from many countries — in translation when necessary — and that teachers have a voice in selecting the examples to be studied.

7.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xtbooks

The need for eliminating from textbooks content characterized by nationalistic biases and propaganda designed to promote aggressive nationalism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but it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practical mean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t is, therefore, to be noted with approval that the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f UNESCO has offered — in its memorandum headed “Analysis of Textbooks” — four concrete proposals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This Conference endorses those proposals. It urges teacher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s in all countries to assist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Cooperating Bodies” to carry 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will be required of them in this connection and, when needed, to prompt those Bodies to initiate action.

and this Conference is also aware of the need to guard against overcrowding the curriculum.

5. *On the Teaching of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uld vastly be advanced if one language were understood throughout the world, i.e., if one language could be agreed upon and recognized as international. Two solutions offer themselves: an artificial language or a living language. Should a living language be chosen, it would be taught in all countries without, of course, replacing national languages.

This Conferenc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 living language is preferabl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However,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for subjecting the entire question to the competent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ly constituted body of experts prompts this Conference to recommend that a commission be appointed by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This commission should be composed chiefly of teachers with scientific linguistic train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nd it should include sociologists and psychologists. The task of the commission would be: (a) to compare and evaluate the various artificial languages in existence; (b) to set forth what claims to internationality various living languages have, and to clarify such conceptions as "Basic English," without, however,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for one specific language; and (c)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s to the advisability of adopting an artificial language as a first or secondar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6. *On the Teaching of Music, Art, and Literature*

Music and art are international in appeal. In large measure, this is also true of literature. Children should not only become acquainted with artistic reproductions, but they should also be led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attitudes of mi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such study is not in itself enough to equip today's citizen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which they must possess in order to have 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the future of which they will help to shape. Contemporary events must be studied directly —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acquiring immediately useful information, but also as a means of developing a lively and intelligent interest in world affairs. Such information and such interest in world affairs are essential for young people if they are to fulfill their duties as citizens of their country and of the world.

For these reasons,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a place for the study of current history in the curriculum, particularly in secondary schools. The teaching of current history must be objective and conducted in a constructive spirit, but controversial matters should not be ignored.

4. On the Teaching of Modern Languages

Knowledge of a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is more than a means of direct communication. The teaching of such a language offer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 student to the life and habits of peoples other than his own; and, more important still, as language reflects thinking habits and character, the serious study of a modern language is a gatewa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speaking it.

Therefore,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that modern languages be taught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learned so effectively that pupils will be enabled to enter into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s speaking them. In making this recommendation, this Conference recognizes that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particular problems and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ts neighbors and local conditions,

and world understanding as a by-product of other lines of instruction which are not aimed primarily toward this objective.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that teachers' associations in all countries take steps to bring together competent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of the several fields of instruction on each of the several grade levels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their respective 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n this undertaking the importance of coordination among the several subject fields and grade levels must be kept constantly in mind.

2.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History as a subject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provides unusually rich opportunities for acquainting students with the ways of living in lands other than their own, for helping them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conditions that exist in the world today, and for helping them to recogniz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eoples. But history as too commonly taught fails to realize these opportunities by giv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wars and petty political struggles.

Therefore, this Conference recommends that the curriculum and method of teaching history should be such that it will give students a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Through history, students should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ife and work of men and women of all nation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human welfare and should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theirs. History teaching in all countries should awaken young people to a sense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 all mankind.

3. On the Teaching of Current History

While the history of former times is essential to a proper

rights of others.

4. Respect for human life and for the religious convictions of other peoples should be fostered.

5. No nation should impose its culture upon any other nation, since no people possesses superiority by reason of divine gift, biological factors, or historical claims.

6.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earth should be developed by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cooperation, and should be used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of mankind.

7. The advances of science have now made all peoples neighbors, mutually interdependent and, therefore, morally responsible for each other's well-being.

8. The security of nations, their right to self-government, their cultural enrichment, and their economic prosperity can be realized on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n organization powerful enough to maintain peace and to facilitate world-wide economic cooperation.

II.

To the teacher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s of all nations,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mak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On Education's Broad Responsibiliti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s of all nations is a responsibility which must be shared by every teacher whether he be a teacher of children or of young people or of adults. Likewise, the obligation devolves upon every teacher no matter what his subject is. There is need for curriculum revision aimed at more direct i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t there is also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sirable international attitudes

專 載

世界教育專業會議關於國際了解之建議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DOPTED IN PLENARY SESSIO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rests upon the cultivation of ide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in all matters affecting human welfare. It does not involve the sacrifice of national culture or national citizenship, or the subordination of one to another. It requires thorough study of world problems, including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 forc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his Conference, therefore, declares that teachers should instruct the youth of all lands to act upon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nd should strive, alone or with others, to make these principles prevail in all areas of human relationship:

1. The fundamental needs of mankind for food, clothing, shelter, health, recreation, and security should be satisfied.
2. Every human being should enjoy,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whatsoever, equal opportunity to develop physically, intellectually, and socially.
3.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the expression of opinion should be unrestricted, except when they interfere with the

小學第一集
初中第一集

金兆梓 朱文叔 鮑維淵 主編
 盧新迪 朱文叔 朱文叔 主編
 盧文迪 華汝成 主編

備的讀物

37094
 47 中國教育學會編
 8054
 中國教育學會年報

預約處
 上海河南路
 及全國各埠
 中華書局

五、目
 閱請

登記號數
 類碼
 卷數
 備註

8054
 37094
 U7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有著作權 不准轉載

華書局

永寧印刷廠
 路八九號

份有限公司代表
 虞杰

學會理事會

元五角
 (加)

平報(全一冊)

CHINA EDUCATION SOCIETY

YEAR-BOOK 1947

ESSAYS ON POST-WAR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CONTENTS

- China Education Society Looks Ahead—A Preface To Its Year-book 1947
Chü King-lung, President of Kwang Hwa University, Shanghai
- The Main Tasks For Chinese Educators
Ch'ang Tao-chih, Professor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nking
- A Summary of Post-war Educational Problems
M. T. Wong, Professor of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Education, Soochow
-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Remaking
S. Chow, Director of Educatio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Abroad, Nanking
- On University Reform
C. J. Yu, Formerly Professor of Chung Hwa University, Wuchang
- What Should Be the New Trends of Our University Education?
P. Huang, Dean of School of Education, Chung Hwa University, Wuchang
- What Is Wrong With Our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and the Way Out?
Ai Wei, Director of China Institute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Nanking
- Salient Problems About the Training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Northwestern Branch of China Education Society, Lanchow
- My Viewpoint Regarding the Improvement of Middle-school Education
Lin Peng, Professor of Taiwan Teachers College, Taiwan
- Reconstruc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S. Y. Ching, Professor of National Peiping Teachers College, Peiping
- Some Problems Regarding a Plan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For the Mass
Lee Chi-ke, Associate Editor, Educational Review, Shanghai
- Ways and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 R. Shih, Formerly Principal of National Vocational School for Printing Trade, Chungking
-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of Vocational Subjects
T. T. Chung, Senior Inspec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king
- Education of Free Man
C. H. Chen, Professor of Szechuan Province College of Education, Chungking
- Education For Appreciation
Y. S. Wu, Professor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nking
- The Birth of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and Its Mission
Ch'ang Tao-chih
- Appendix I.—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dopted in Planary Session, Endicott, N. Y., U. S. A., August 27, 1946,
- Appendix 2.—Recent Events and Resolutions adopted in the Meeting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hina Education Society.

Published by Chung Hwa Book Company
Shanghai, China

48

中華民國拾陸年玖月拾壹日

民國陸拾柒年陸月拾壹日收訖

40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647532